les+

29
Aug/2013



女同运动的分歧与联合

LESBIAN MOVEMENTS: RUPTURES & ALLIANCES

ILGA

国际女、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间性人联盟。它是一个着眼于全球全国性或地方性组织联盟，为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双性别者争取平等权益和反对基于性倾向和性别的歧视。

联络ILGA
women@ilga.org
www.ilga.org

les+

les+是面向中国拉拉（女同性恋、女双性恋、爱女人的跨性别人士）的文化传播
非营利民间组织，成立于2005年11月。以文化建设、艺术探索、媒体倡导为主要方式，为中国女同性恋、女双性恋、爱女人的跨性别人士创造话语空间，促进社群和公众的观念改变，实现性别和性倾向多元差异的可能性。

联络与支持 les+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lesplus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123347/
网　　店：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网　　站：www.lesplus.org
邮　　箱：lesplus@yahoo.com.cn

目录

目录

游说，女同性恋在哪儿？

原书致谢

我仅代表ILGA，向对于为现今刊物作出慷慨贡献的女同性恋者们表示谢意。感谢她们同意接受访问，写下文字，将她们的刊物、演讲节选寄给我，分享故事或者提供照片。

我们对 Dani Frank 表示特别感谢，感谢她对我们整个项目的热情帮助。我们也要非常感谢 Stephanie Lange，感谢她在我们需要她时，每一次都腾出空隙。此外，我们也要感谢非常出色的志愿者们，感谢他们寻找，收集讯息，翻译，记录访问和校对文字，他们是：Tom Hoeming，Ruben Alonso，Pierre Simard，Gabriela Lozano, Simona Testa，Nathalie Vilain， Johnathan Sanders，Agnieszka Szmerek， Eric Lesh and Rachel Hinckley。

对于我的伴侣 Marie-Paule Lolo，感谢她帮我在做选择的的时候，一直将女权主义的角度存放于心。她的鼓励和建议让我有持续的动力，这是花时间将刊物做的力趋完整的最必不可少的。

此外，还要感谢 LBL 为我们提供资金，同样感谢 Global Fund for Women 和ILGA Women’s Secretariat，RFSL，感谢他们给予道德上的指引和经济上的支援。如果没有Oxfam Novib和Hivos对我们的发展前景多年来的支持，这本刊物是不可能发行的。

Patricia Curzi
女性项目协调人
ILGA

激发并酝酿制作这本刊物的想法源自一句话

“我们，女同性恋者，遍布各地”。

简介

这是事实。女同性恋者在各种民权运动中同男同性恋组织一起发挥作用，在各种女权主义团体、艺术圈、旨在去殖民化和国家独立的运动中发挥作用。近几十年，女同性恋者在为有色人种女性，土著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中及广义上各种女权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些团体给予女同性恋人群极少的关注。当她们需要寻找团结的力量时，女同性恋者们毫无选择只能自成一派发起运动：她们必须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权利而孤军奋战。即便是今天，女同性恋的议题普遍遭到忽视，她们参与主流的社会运动却不被认可，许多社会运动的成果依然被认为是由她们传统的盟友，女权主义者和男同性恋运动取得的。

这本刊物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参与女同性恋运动、民权运动和人权组织的个人经历结集成册出版。为了帮读者简化概念，本刊中的女同性恋是指任何自视为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双性别者、酷儿，或者不愿意视自己为任何已有身份概念的人。本刊意在赞誉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领导或参与为女同性恋者们争取权利和认可的女同性恋者们。刊物收录了学术文章、访谈，以及相关报告的节选和简要。本刊描摹了几位具有影响力的女同性恋者，她们有些是历史上人物，另一些则是当今的画家、作家、诗人或哲学家。尽管作为群体中的一部分，ILGA中的女同性恋者不被重视，还必须争取外界对自己的认可，但正如本刊收录的那些人物的出众成就所表明的，今天我们可以对已有成就感到非常骄傲，我们自然将她们的经历、经验收集其中。

虽然我们想要传播这些出色的例子，但是我们意识到为了理解女同性恋者所有的经历和参与的运动,仍有许多需要学习。这本刊物将会留下许多问题，例如什么是女权主义，为什么女同性恋者在主流社会运动及LGBT群体中被忽视，为什么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之间的关系仍有困难，女同性恋议题与女权主义还是男同性恋议题更紧密关联。在刊物中你可能发现几页之间就有相反的观点。由此看出女同性恋运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希望这些问题能激起你的好奇心去更多地了解不同的或者紧密相关的社会运动。“我们，女同性恋者，遍布各地”，我们为此骄傲。

Patricia Curzi

Women's Project 协调员，ILGA

中译本序

上世纪90年代至今，女同运动如旷野星火，逐成燎原之势。几乎没有任何资源支持，凭借着改变现状的本能，女同志们纷纷加入到中国的女同运动里，我们建立小组，我们创办活动，我们从活动中看见彼此，我们走上街头发声呐喊，我们同男同性恋组织、女权主义组织、社会倡导机构站在一起，我们为当下中国的公民运动发挥着我们独特的作用。

回顾过去，我们发现，即使积累了一定经验和成果，女同运动依然困难重重。同性恋在中国依然是禁忌话题，女性在传统性别观、婚姻体制压迫下可选的生活依然屈指可数。在性和性别的双重压迫下，女同运动的议题不是反污名化，而是如何被看见。

基于共同的性倾向议题，女同志与男同运动天然地联合在一起，渐渐地，女同志开始思考，身份议题如何真正面对并改变现有的异性恋霸权体制？基于共同的性别平等议题，女同志与女权主义者联合在一起。毫无疑问，女权主义带给了女同志理解同性恋的政治角度。女同志即使在LGBT运动里，我们与女权主义面对的敌人依然是一致的，父权社会带来的性别不平等。它是给予人们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采取政治行动的工具,这也成为近年来很多女同志加入女权主义行动派的原因。女权拉拉们通过自身的自主性，也让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了女同运动人士有着更彻底的性别反对意识。

如何与上述运动和种种团体联合以及处理分歧、差异，对中国女同运动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里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公式，但过程本身却拓展了行动者们看待这个多样化世界的宽广角度。

因为在与女权主义者们及男同性恋一起奋斗的同时，我所了解的许多女同志也一直参与到其他的许多社会运动。或许因为对于权利平等和歧视有着比性倾向更广泛的认识，女同志更能够体会到运动的终点是形成一个为了许多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而起的社会运动，把LBTQ人群融到这个框架中。公民、民主对于国人来说，非常陌生。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如何通过维护个人权益来促进国家之发展，这也成为女同运动加入到中国公民运动的契机，两者都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体制下奔跑着发展。

我无法定论，说女同运动有着比其他社会运动更团结的能力，女同志的确常常在反复的理论争论中，显得不那么有效率。女同也许常常过去独立，与其他运动同伴相比，不懂得聪明地将自己的诉求成功主流化、商业化。

有趣的是，同样的探索历史，曾经发生在海外其他国家，发生在近几十年的国际女同运动里，不仅多样性的女同运动是存在的，而且，她们也同样面对着女同运动的分裂与合作，主流权利与多重歧视，令痛楚的冲突与界限的拓展，她们的运动历史、故事、个人感慨构成了这本《女同运动的分歧与联合》。

希望借由中译本的发布，能够促成中国女同运动历史的整理，因为，当女性力量的声明被遗忘时，每个女性都会变得更微弱无力。历史知识对激励社群是必要的，这能为有志投身政治的女同志提供精神食粮，并防止对女同性恋经验历史的过度简化。

最后，我们的运动是为了谁？如果我们不能从人的角度，推动当下每一个参与者的主体意识和权利关系的平等意识，我们的运动就不会是成功的。这本身，就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公民运动实验。

我们身处这场未尽的实验里，拥有权利和责任，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也将看到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Sam
les+杂志主编

制作团队

中文版策划编辑：Sam
中文版编辑校对：费朗夕
翻译：童亚琦、莎莎
设计：林娟、Sam
特别鸣谢：窦誉笙、Boo、kiwi
原版项目主管：Gloria Careaga
原版主编: Patricia Curzi
照片来自：感谢以下人员提供的私人照片和相应版权许可
Moutsy, Brigid Ganske (AWID), Khumo Ntoane (AWID), Max (Drag Kings Brussels), Cynthia Rothschild,Joane (MMF), Barbara Lévadé, Poedjiati.
书号：ISSN 0281-627X



从 IGA 到 ILGA，为什么“L”很重要？

在很多情况下，女同性恋们必须在LGBT组织内部争取空间，在国际体系里面争取让自己的议题得到关注和认可。ILGA里的女同性恋者们也不例外，她们始终努力着。以下简略的历史回顾描述了一些女同性恋者在ILGA中所扮演的成功的角色。这些从参与ILGA的女同性恋者处收集的个人叙述展现了她们就如何经历这些的个人观点。我们在ILGA的论坛上找到了一篇发表于1991年的文章，文章为活跃在ILGA的女同性恋者对于如何在一个性别混合的组织中工作给予了意见，其中大部分的意见于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适用。

ILGA 的历史沿革

ILGA全称国际女/男同性恋联盟。它是一个着眼于全球全国性或地方性组织联盟，为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间性人争取平等权利。1978年它以IGA为名（国际男同性恋者联盟），由几个男同性恋者组织成立。2009年它已是遍布世界110个国家，拥有670个组织的联盟了。

当我们提到ILGA的建立时，我们通常是指初始几个男同性恋组织的一个会议。我们倾向于忽略其实大多数的男同性恋组织是性别混合的组织，有许多女同性恋者在其中发挥作用。在IGA建立后一年，1979年会议陈述了女性在这些组织中无法获得应得的代表权利但非完全缺席的情况。如果因为这一席陈述，我们就相信，随后写入组织宪章的“性别平等”是在向女同性恋者示好，我们就太天真了。直到1986年L（Lesbians）才使IGA变成ILGA。经过多年讨论，在1986年13届哥本哈根世界会议上，组织成员决定为了认可女同性恋者所做的贡献，将组织名字从IGA改为ILGA，同时增加了两个秘书长的职位，规定由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分别担任。另外组织还正式分设了实际上从1980年第二次IGA世界会议后就存在的女性秘书处。1986年设立的女性秘书处才是正式承认女同性恋者们对ILGA的贡献，接受她们是需要分别考虑少数中的少数者。自第一次世界大会至今，女同性恋者在组织中总是占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她们组织会前会议或者工作坊来讨论相关议题。

1992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会议上采取了新规定，ILGA应该开始区域化的进程，在每一个有ILGA会员的地区慢慢创立区域性组织结构和管理人员。这项规定于1997年在于科隆召开的世界会议上被写进宪章，至今，规定几经修改仍在执行。从ILGA六大区域（非洲、亚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岛国、欧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国家、北美洲）来的男女各一名代表，与男女秘书长、女性秘书处代表们、跨性别秘书处代表们，共同组成ILGA全球董事会。这些都是经选举产生但没有报酬的工作岗位。

为了改善即便在积极的LGBT活动家中也存在的性别歧视，跨性别秘书处正式成立于200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3届世界会议。和女同性恋者们在组织内部争取空间一样，跨性别者也采取了会前会议、工作坊和在ILGA的称谓中加入代表自己的trans，因此，在于2008年威尼斯召开的第24届世界大会上，ILGA正式命名为国际女/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间性人联盟。

通过改写宪章来彰显女性领导力及各种性别人群的权利，ILGA成为世界上少数已开始积极地追求性别平的的组织，而它也

将继续这样的追求。

非常感谢荷兰基金会Hivos从九十年代中就给予ILGA的经济支持，因为它，ILGA能够成立一个全面运作的工作室。2004年另一位来自荷兰的机构Oxfam　Novid承诺资助一项三年的项目，意在增加女性在ILGA的参与，这项资助延续到了2010年底。由于Oxfam　Novid的赞助，我们得以在2005年一月雇佣了一名“女性项目”主任，她的任务是在增强群体关注度、交流和外联，鼓励女性多多参与ILGA内外的政治活动。截至2009年，ILGA已有四名全职雇员及许多学员和志愿者。

Jackie Lewis

ILGA和ILGA前欧洲董事会成员，目前为ILGA待任董事，英国商业工会UNI-SON的工作人员。

1995年六月，我作为UNISON三名代表中的一位参与了ILGA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17届世界会议。这是第一次ILGA世界会议在全球南部的发展中国家召开，毫无疑问这对巴西的积极分子和团体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巴西自1988年才成为民主国家，且它是一个平均四天就发生一次因性取向而暴力谋杀的国家。ILGA的国际会议预示着新的变化。在巴西，媒体对这次会议的报道非常出色，有两家全国性的报纸每天都对这次会议进行报道。在会议结束后，第一次骄傲游行在里约热内卢举行，有2000人参加，是当时巴西境内最大规模的骄傲游行了。一项全国性的民调显示60%的巴西人愿意接受和承认同性伴侣的关系。

这次会议非常的精彩有效，有大约60个国家参与。这显示ILGA逐渐增长的多样性，和除北美和欧洲外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我积极参与了关于ILGA未来走向的讨论，我们讨论了ILGA区域化的问题。为2008年ILGA30周年所搜集的叙述

ILGA现有成就

众多的国际宣传活动成就了ILGA的主要胜利：

在新西兰和爱尔兰的游说活动使这两个国家将同性恋去罪化。在许多国家，尤其在许多东欧国家，ILGA促使自主的男/女同性恋，跨性别者组织出现。ILGA对1990年五月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国际疾病分类中删除助力颇多。

经过多年的宣传活动，ILGA及其他组织说服了大赦国际在1991年将因性倾向关进监狱的同性恋者归为“良心犯”。ILGA在许多国际组织中，例如联合国，代表着LGBT的利益。

一些女同性恋活动家作为ILGA成员，参加了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会议。她们要求将女同性恋议题加入到官方的会议进程：在会议过程当中，她们建立了一个女同性恋“大本营”。

自从2005年起，ILGA与来自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组织一起展开宣传活动，向联合国申请“咨商地位”。

2003年，巴西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介绍了巴西人有关性取向问题的决议。ILGA支持这项决议并发起了宣传活动。2004年ILGA向人权委员会主席呈递了45,000人签名的请愿书，但此决议在2006年被驳回。

自2005年起，由于与国际各非政府组织的合作，ILGA能召集组织来自世界各国的女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男同性恋的社会活动家参与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工作中。

2006年，ILGA与许多非政府组织协力参与了初始工作，最终催生了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召开的有许多国际人权专家与会的会议。此次会议促使关注性倾向、性别平等和国际人权法的《日惹条约》的发布。这是一份国际通用针对人权的导言，最终为国际法律设定了标准，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循。这份条约被游说活动家们广泛用于对国际体系，例如联合国的游说。

2006年，ILGA发布了一本叫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健康的刊物，其中有对前联合国有关健康的大会特别起草人Paul Hunt的访谈。这本刊物得到成功出版，ILGA还通过志愿翻译者、各个成员组织、女性秘书处和RFSL将刊物译成法语和西班牙语。

ILGA几十年在联合国的努力终于出了成果。2007年八月，Gloria Careaga，时任ILGA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女性代表，被邀请以ILGA代表的身份出任联合国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女性议题的专家。ILGA保持与地方性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确保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身份的歧视得到联合国的持续注意。

ECOSOC 资格

非政府组织最初通过ECOSOC（社会经济理事会）得以在联合国事物进程中发挥作用。1946年，41个非政府组织被ECOSOC赋予了“咨商地位”。如今，大约3187个组织获得此地位。咨商地位使得各非政府组织能够进入联合国，以自己的名义发声，在全体会议上口头干预，组织各种议题讨论小组。咨商地位通过ECOSOC负责非政府组织的理事会推荐来获得保证。理事会由19个会员国组成。

关于ILGA参与ECOSOC的简短历史：

1993：ILGA获ECOSOC地位。

1994：ILGA失去ECOSOC地位。

2002：ILGA再次申请并遭拒。

2005：ILGA组织了宣传活动意在使LGBT组织申请ESCOSOC地位。

2006：ECOSOC拒绝了ILGA的申请，但给予ILGA欧洲，LSVD德国男/女同性恋联盟及LBL丹麦全国男/女同性恋组织“咨商地位”。

2006：GALZ津巴布韦男/女同性恋组织，ABGLT巴西男/女同性恋组织的申请决定被延迟。

2007：ECOSOC地位给予了RFSL瑞典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权利联盟，CGLQ魁北克男/女同性恋联盟，FELGBT西班牙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群等。

2008和2009：Lestime and Los，两个瑞士女同性恋组织的申请决定和IGL-HRC，国际男/女同性恋和人权委员会的申请决定被延迟。

Vibeke Nissen和 Inge-Lise Paulsen

ILGA女性秘书处成员，1990至1993年主持丹麦LBL，著有“女同性恋可见度”研究。

我们曾去雅典造访一个大规模的女性组织，其中一位女士带我们参观并以漂亮的英文向我们介绍这个组织的工作。我们以ILGA代表的身份造访，所以我们以为他们知道我们是谁，ILGA是什么。但她一定是误会什么了，因为在造访结束时我们向她询问有关于女同性恋议题时，她吃惊地看着我们回答道：“这是一个女性组织。”我们随即离去，在一家咖啡馆点了两杯很浓的咖啡。

女同性恋可见度研究是一项ILGA的项目，由丹麦LBL执行，其经济来源由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平等机会单元提供。这份研究是基于100多个来自欧盟国家女同性恋者的录音访谈。它意在指出欧盟国家中关于女同性恋议题的现实，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意见以及向欧盟成员国提供意见帮助。它于1994年发布。为ILGA30周年所搜集的叙述

Grada Schadee

荷兰组织 Groep 7152 代表，1986 至 1989 年间为 ILGA 女性秘书处工作。

我在1986年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会议上加入了当时还是国际男同性恋组织的IGA。我记得由于一些丹麦和瑞典女同性恋人士的积极工作以及一些男同性恋者们的支持，IGA将名字改为ILGA，彰显了女同性恋者们对ILGA的贡献。在那次会议还成立了女性秘书处，而我所处的组织Groep7152 被选举来掌管秘书处。

作为LGBT活动家，接下来几年对我们来说非常糟糕，因为当时艾滋病蔓延且病因不明。每一届ILGA的世界大会上，我们都会悼念因这个可怕的疾病而失去生命的朋友。往回看，我对我们不遗余力地增加对艾滋病的认识而感到骄傲。有时人们问我是否已对为LGBT争取权利感到疲累。是的，我有时的确感到很累。我确实会踢着石子儿嘴里咕哝抱怨，“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受真正的我们？”然后我提醒自己：人们是能够改变的——并且确实正在改变，尽管过程缓慢。但你必须促使他们改变。

为2008年ILGA30周年所搜集的叙述









如何建立一个给予女同性恋者平等权利的性别混合组织

1991年2月，ILGA发表了关于女同性恋议题的特刊。我们发现了Mia Hilscher的一篇文章，她为HOSI 奥地利维也纳同性恋倡议工作。文章是关于在欧洲区域会议里的工作坊的一个思想总结。它的内容至今仍有意义。不过时代在变。我们希望你能找出其中过时的两点！我们的答案在文章最后。

如果其中有些建议也适用于其他组织，请自便！

“这篇论文并不讨论男/女同性恋者关于彼此很难合作的常见抱怨。当然，总有不愿意与男性合作的女同性恋者的存在，同样也总有一定程度上的性别歧视、无知和男性主导的存在。如果一个全是男同性恋者的组织想要吸纳女同性恋者，他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及怎样与她们合作（比如说，修改宪章等）。

女同性恋者如果想要在全男性的团体中获得平等，她们必须清楚更多的权力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工作量。尽管如此，这样的努力还是非常值得的。男同性恋者有义务将这样的合作变得对女同性恋者富有吸引力。他们应当考虑，作为一个组织，他们能为女同性恋者们提供什么而不是他们能从参与组织的女同性恋者处得到什么好处。

给新进男性主导的组织的女同性恋者们的建议，或者说，如何完成它，

1. 请勿不假思索地采取男性的标准和做事方法。做你自己，慢慢来，坚持自己的风格，展示你女性特有的创造力和狡黠。

2. 做好在该组织中应该做的事情；用男性能够理解的方式去准备和呈现你的工作；投入你的工作，表现得有安全感，即便你还没有。他们也经常虚张声势的。

3. 请不要让你的时间被悄悄夺去，你的能量被耗光，你的议题被戏谑或是你的努力被轻视。保持你的尊严。

4.请不要将好的或坏的性格特征在第一印象中归咎于对方是男同性恋。有时那只是用词不当，或是单单的无知，而非恶意。请避开谣言和狐疑，确保你深入了解不只是停留在表面。

5.请不要局限你自己仅仅只是对他们的提议做出反应，要积极，即便没有被问到也要向男性们提出你自己的观点，在重要的议题上不要退让。

6. 请不要害怕活跃的讨论，有时甚至是情绪波动的争论和冲突。只要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争论什么，就会有好的那一面收获。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有理地质疑对方。

7. 如果男性们变得“混帐”了，尽可能地保持冷静并且质疑他们的自信（或高傲），指出变成“混帐”并不是成年人彼此

联系的成熟方法。向他们询问他们的偏见，情感上对某些事情的困难，假设他们变成“混帐”是有原因的。确保消除误解，澄清问题。帮助他们折回共同话题，但是坚决拒绝帮他们做所有的事情。

8. 拒绝做该组织的二等公民。不要局限你自己仅仅是为他们打印、倾听、礼貌地寻求他们的好意等等。不要给他们拿水和食物，除非他们也愿意为你做同样的事或者付你很高的工资。请不要当男同性恋者的妈妈，保姆或者治疗师。这些事情是爱情中的女人会做的，如果你为他们做这些就加强了他们对女性和对女性天性的偏见。让男性们自己做这样的事，这是他们成熟的标志。

9.拒绝参加男性游戏，例如互相攀比决斗、分而治之、或是修辞上的决斗。你不会讨厌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最好通过举例子）教他们一个充满爱的态度，在组织内推行真正的民主（因为缺乏男子气概的男人同女人一样也是弱势群体）。

上文提到我们的答案是：

第一点“女性的狡黠”，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她影射了女性和女同性恋者天性是狡黠的。

第七点，这条建议鼓励女同性恋者做更多的教育和处理情绪方面的工作，又一次验证了这些都是女性被教导要做的。

Christine de Pizan

(1363-C.1434)

她以欧洲第一位女性职业作家而著名。她强烈质疑了厌女症以及各种在中世界男性主导的艺术领域内针对女人的偏见。她的书《女性的城市》创造了一个象征性的城市，在城中女性被欣赏和保护。她通过对当时社会的分析总结出在性别混合的社会中，由于男性对待女性的方式，女性永远不可能幸福。因此，女性应该退到一个只有女性、属于她们自己的地方。

十五世纪，法国！









从女权主义汲取力量

女同性恋者们总是作为个体或者团体为她们的尊严而战。而女权主义作为一个社会运动和一种分析社会的方法确实给了女同性恋者们很大的鼓舞。女权主义一般来讲是一套就社会、政治及经济方面男女平等的理论，但女权主义有非常多的理论，有的甚至彼此意见相左。因此，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单一版本的女权主义。对于不同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的人来说，做一名女权主义者也有不同的意义。

这一章以女权主义的“一种”定义开始，通过一些文章和访问，从机构还是个人自治，地方的、区域的或是国际的几个方面，概述我们如何看待并经历女权主义。联结这些不同女权主义表述的是女同性恋者经久地出现在这些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运动中。有些运动是由女同性恋者自行发起的，有些则是她们顺应参与到已有的主流社会运动中，尽管主流运动有时掩盖或者低估了女同性恋者们的力量。

请勿冀希于得到关于女同性恋者应该通过自己自主的组织还是参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来争取自己权利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找不到神奇的公式。但是你可能会找到一个看待这个多样化世界的宽广角度。

女权主义的三次浪潮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女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理论，要给女权主义一个统一的定义几乎不可能，但女权主义可以被广泛地分成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第二次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初年早期至80年代末；第三次浪潮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开始于十九世纪中的英国和美国。当时，北美，拉丁美洲，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始了对女性的动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次运动主要关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普选。

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一段时间。运动主要关注性别歧视的男权至上的社会结构，其表现为男女文化、政治上的不平等。它处理了多项社会议题，例如官方法律的不平等，性别，家庭及工作场合，生育权等。其中一些议题延续到了第三次浪潮。

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从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至今。对于许多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者而言，这次浪潮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体制和机构内，例如管理层面、政治领域和学术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大会推动了这样的趋势。对于另一些女权主义者而言，特别是北美洲的女权主义者而言，第三次浪潮更像是之前持异议的女权主义的影响，例如黑人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女权主义，遍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同时还有男/女同性恋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反资本主义运动，移民潮和酷儿运动。

当女权主义者联合起来

Patricia Curzi

发展中的妇女权利联盟（AWID）第11届女权主义论坛于2008年11月14至17日在南非开普敦召开。大约有来自世界144个国家的2000名女性参加。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如何加强女权主义运动，如何克服其中的分裂，以及如何扩展与其他社会运动的战略合作。

ILAG资助了三名分别来自非洲，亚洲以及拉丁美洲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我的出席正符合ILGA想要与更多的女权主义者组

织合作的意愿。当看到这么多女性在同个地方讨论、社交、组织和参与一个又一个的工作坊，同时努力对紧凑的四天里的书本展示、戏剧表演、抗议游行、舞会等所有旁支活动保有活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会议每天都以一个全体出席的讨论开始，之后有许多工作坊可供选择。在第一天的全体会议上，一位来自MEEM，黎巴嫩LBT组织的代表关于女同性恋和女权主义运动的演讲给所有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超过20个LGBT组织出席了这次论坛。ILGA去的目的不仅仅是参与各个环节，也是去非常细致地寻问LBT女性是否融进了各个女性运动及社交网络，如果没有，ILGA建议那些组织如何做到。ILGA在工作坊中得到了关注：我们提问、社交、参与其他LGBT组织的工作坊。多种多样的工作坊涉及到了许多主题比如残疾、性工作者、青年女权主义者、女性与运动、性及生育权、艾滋病与女性；同时也公开反对恐同症，表达了对在阿拉伯世界建立酷儿或是LGBTQI的女性运动，和东南亚酷儿运动等的希望。

11月15号的游行意在提高对世界各国女性维权人士的谋杀，强奸和暴力及全球各地刑事司法和政府未能为之提供改善和正义的关注度。AWID的参与者拿着标语在开普敦穿城游行，并向市长提交了请愿书。

AWID论坛以一个顾问小组对各环节的总结和对未来的建议作为结尾。其中一条建议是我们需要将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间性人的女性融入到女权主义的各种工作中，并终止我们的偏见。

从这个论坛中，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异于普通的行为模式是多么容易令人害怕和招来歧视。女同性恋者们与其他作为少数群体的女性，例如各种种族、文化、宗教和经济条件的群体有许多共同点。由于不同的年龄、经历和来自于不同地方，人们可以有许多种当女权主义者的方法。从这个论坛回来以后，我带回了许多想法、新认识的人，而且感到非常激动，因为认识了新的活动家们或是重新认识了一些著名的活动家。一个星期中我都在这么多强大的，全身心投入的女性中间，这是一个赋予我力量的工具。许多女权主义组织最后都恭喜ILGA出席的这个活动。ILGA参与到AWID女权主义论坛是它迈向更多地参与女权主义的第一步。

AWID,
发展中的妇女权利联盟

AWID是一个国际化的会员制组织，经历了多次组织更迭，始终着眼于女权主义议题，富于创造力，以未来为导向。它意在实现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和女性的人权。它在多伦多，开普敦和墨西哥城设有办公室。它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决策者、学者、研究员、活动家、商界人士和投资者，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

www.awid.org

将阴道带入
阿拉伯女权主义的对话中

2008年四月Nadz在摩洛哥女权主义者会议上发言的题目的力量不言而喻。如果你在寻找一位年轻的，充满力量的女性主义者或是出色的活动家，请阅读下文。

Nadz，是一位25岁左右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活动家，她起初参加了黎巴嫩LGBT组织Helem，之后与其他活动家们创建了LBTQ联盟MEEM。她刚刚发行了新书“Bareed Mista3jil”。新书是41位黎巴嫩酷儿女性和变性者故事的集合。

“我受全球女性基金的邀请参加了2008年4月在摩洛哥由发展中的妇女权利联盟组织的会议。那次会议的话题是如何为处在中东和北非的女性权利组织动用更多的资源。除了20位为女性权利工作的国际投资者外，还有超过100个组织受邀出席。我以匿名为要求注册出席，因为我发现在这个地区的女性权利团体还不能接受一位来自MEEM的阿拉伯同性恋活动家。

我在第一夜凌晨1点到了会议住处，我同另外三名年轻女性同住。我遇到的第一位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女生，她为一个支持设立保护女性权利的民法的机构工作。我们谈了半个小时然后她问我做了些什么。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告诉她，我在黎巴嫩为女同性恋议题而工作。她吃惊地看着我，说这是她第一次听到阿拉伯世界在商议这样的议题。她被打动了并对此非常支持。当晚入睡时我感觉这个对话给了我力量，我对自己说：好了，一个人同意了，还要与149位参与者谈。

第二天早上，AWID特别为年轻的女权主义者们组织了一个会前会议，共有来自中东和北非的30位参加。会前会议的目的是为这些被年长的活动家低估和边缘化的年轻女性提供空间来讨论他们年龄段特有的议题。在自我介绍环节，我又犹豫了一会，

MEEM

MEEM是为在黎巴嫩的LBTQ女性建立的社区。LBTQ被定义为自认为是同性恋、双性恋、变性（包括男变女和女变男）、酷儿以及对性取向有疑问的女性。MEEM是基于平等、支持、保密和尊重这些价值而建立的。这个群体是根据女性应该被鼓励通过互相支持而给他们自己和别人力量的这个想法而建立的。MEEM成为一个不公开、私密的团体，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它为成员的安全做保障。他们对于自我组织而获得力量有信念。www.meemgroup.org

然后介绍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的同性恋活动家。没有人因此畏惧。尽管有些人不理解我说了什么，但起码没有人表现出畏惧。在随后一天的工作坊中，我自由地加入关于女权主义寻找资金，如何建立社区的讨论，一天结束后，我与所有人交上了朋友。年轻的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埃及女孩找我问了许多阿拉伯世界里女同性恋的问题。第二天，会议正式开始了。想要知道这个聚会如何，你就想象中东和北非地区女性权利运动中最响亮的名字。坚定的充满智慧的成熟女性，那些组织的主席或是董事，为女性权利在政治代表、法制改革、经济权利和针对女性的暴力等议题效力了几十年，却从来没有在性这个话题上做过什么，因为性从来都不重要。

第一天的会议简直无聊透顶。我长时间地坐在那里，都是些旧的讨论，旧的唠叨，旧的问题被提出来，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另一些空话，比如说“能力建设”，“联盟”简直让人作呕。第二天的仍是老一套，没有可执行的计划也没有新的想法。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会议的组织者似乎看好我，把我放到了接下去一天的小组里。“你可以说任何你想说的”，他们告诉我，所以我觉得我要插入其他小组讨论成员的对话，说点值得说的，说点别的。到那时为止，我交了更多的朋友，与更多的人有了交谈，因而为MEEM建立了很好的信心和支持。

第二天早晨我九点就开了小组讨论，我忘了其他人在说什么：可能是有关和平，联合起来，民主这些。轮到我说的时候我心里想：“X他妈的，我有多少机会能一次同这么多女性商议？”所以，我对所有人说，我觉得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很好地商议女权主义，在我们各自的组织里也没有很好的谈论。我解释了女权主义对我而言是什么：它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事业。我说，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身体来争取女性的权利。我说，阿拉伯世界的女性权利活动家应该讨论阴道。令我吃惊的是，在座的人给了我热烈的掌声鼓励我继续说下去。我说了，女权主义成不了女权主义除非把有关性的议题包括进去。我谈论了摧毁处女身份的传统建构，将堕胎合法化，反对强奸，乱伦和性骚扰，拥抱女性的性。我说女性运动不能再将女同性恋者们排除在外，把她们当成不完整的女性。我讲得忘乎所以，接着谈论了一个阿拉伯女权主义革命。我越谈，人们鼓掌越热烈，会议的整个对话进行得更勇敢，更诚实。之后的讨论关注了让女权主义包容更激进的新技巧。也有人提出对我演讲尖锐的批评，说它变态，令人羞耻。但我无需多说什么。令人惊喜的是在场多数女性的支持已经足够扳回一局了。

这之后，我与多数与会者对话，解释MEEM主要工作和战略，请求她们组织对在阿拉伯城市的女同性恋者们开放。黎巴嫩女性组织特别热情地邀请MEEM成员去她们的工作坊和培训。我对人们对于在阿拉伯女权主义中包括女同性恋议题的回应感到十分感动和吃惊。这是对于阿拉伯女同性恋运动是充满历史意义的一天，也是迈向真正完全的平等的坚实的一步。

女性的世界游行
女同性恋议题得到足够的关注了吗？

Patricia Curzi 对 Diane Matte的访问

Diane　Matte作为一名女权主义活动家已经很长时间了。她本打算成为一名老师，但她却为加拿大渥太华的一家处理性骚扰的中心工作了十年。1995年她在魁北克组织了一次由40,000人参加的坚强女性抗贫穷的游行，也叫“面包与玫瑰”。她是女性的世界游行其中一位创始人，也是这个反全球化运动的秘书长。她现在任职于反性剥削联盟。

你组织了2000年女性的世界游行，这个游行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了实现它遇到了哪些困难？

女性的世界游行是女权主义者国际性的运动。它召集草根组织为了消除贫困和针对女性的暴力而努力。它的价值观和行动意在带来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改变。它涉及许多主题：比如说团结的全球化，男女平等，对女性多样化的认识和尊重，强调女性领导力和加强女性之间的联盟，以及与其他有远见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联合。自2006年开始，这个游行已经成为一个正式的而不是一次性的活动了。

这场游行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它能联合上千个女性组织，因为这些女性想带来真正的社会改变。在一些国家，这场游行原本互相不知的女性们及各个女性团体之间建立了纽带，使她们携手合作。在一些女同性恋组织中，比如说葡萄牙，巴西，印度和秘鲁，这场游行将她们与世界连结，也将女同性恋议题放进了更大的女性议题中。在另一些国家中，女同性恋议题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导致一些组织特意与这场游行撇清关系。但我没从停止谈论过女同性恋权利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的分析报告。我们相信只有充分了解关于女同性恋的现实以及更清楚地理解“被强加”的异性恋如何将女性置于男性主导之下的，真正的改变才有可能。

女同性恋们，在创造、组织、发展和参与在这个项目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我们在蒙特利尔的组织团队大约占了所有员工的三分之一。它是许多女性运动在不同的国家如何组成很好的例子。在1998年蒙特利尔展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上，有来自世界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参加，有关女同性恋的诉求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些组织说如果女同性恋议题囊括在了这个平台里，他们担心在他们国家里无法动员合作伙伴。有些团体当知道女同性恋者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被认可的现实后有了畏缩。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将女同性恋者的诉求提交到一个单独的采用过程中。我们确实认为为了既

定的2000年的目标而开始交流和实施反女性贫穷和暴力的行动更为重要。我们同意另设一个工作组负责起草将要派给所有参与团队的阐释文件。有来自80个国家的大约3500个女性组织收到了这份文件。

为了实现承诺，我们给了那些还没有处理过女同性恋议题的国家的组织，或是那些感觉脱节的组织机会，让他们了解和接触女同性恋者们。贯穿整个游行活动，这样的做法引起了一些紧张气氛：有些国家的组织拒绝处理国内的这些议题，但另一些则是抓住机会普及关于女同性恋的现实，消除女同性恋只是一个西方现象的误解。

我感觉如果真想带来改变，我们需要专门的女同性恋运动来为独特的诉求发声，反抗歧视。不管如何，我们都需要对所有的女性团体进行教育，这只能在对话中进行。在一年又一年的大会上，那些参与国际会议的女性组织知道了分析性的辩论，比如说关于性权利的。有时，我们必须回答非常基本的关于什么是女同性恋的问题。我知道，在最近的一次2008年10月格莱西亚世界大会上，关于女同性恋权利的问题没有引起争议。女性们接受了这就是现实，会议也会继续向追求女性权利的方向努力，为了所有女性的权利。这对我而言是一个胜利。

平等的动力
北京+10 回顾和全球女性人道宪章

自从1995年在北京的会议之后，甚至在这之前，女同性恋们开始参与反对包含对女性歧视的法律。但是“北京宣言”和“行动平台”都没有具体条款承认女同性恋者有与其他女性同样的权利。关于女同性恋者权利的问题从没有超出过联合国政府间关于女性生存状况的会议。公平的说，在筹备北京1995年会议的时候，有几个NGO支持在“北京行动平台”中加入一项意在禁止对基于性倾向的歧视的提议。但只有少数政府支持这个提议，因此它没有被写入最终成文的条款。女同性恋者的权利再一次在笼统的女性性自主的诉求中稀释了。

在来自60国的女性组织和女同性恋组织的协商之后，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在2005年全球女性人道宪章中。它起先包括了基于性取向的歧视，但后来为了让一些保守的国家政府接受此宪章，它在宪章的最终版本中被移除了。

ILGA认为女同性恋群体不仅是最弱势的，而且她们几乎不被提到。但是，我们很高兴宪章的最后版本提到了恐同症是一种歧视，它也非常清楚地陈述了所有的女性都应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北京+10的活动以及它的相关活动是将世界的关注聚焦于在广泛的性别平等里女性和女同性恋议题的好机会。

ILGA, 2005年2月25日

你对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工作和关注度有什么想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你对此的想法和感觉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必须让我们女同性恋者的身份受到关注。我知道不是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的事情，但是我们越努力，就越有给其他人出柜的空间。我自从第一次会议之后就以同性恋的身份受到关注。我令一些人感觉不舒服，但是没有一个人反对我。

我还认为我们从一个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对于当前状况的分析需要更完善。一方面来说，极少的论坛提供给舞台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谈同性恋。女同性恋者经常面对没有女权主义，反帝国主义，反种族主义成分的LGBT运动。另一方面来说，女权主义运动多次离析女同性恋者的诉求以及对于强迫的异性恋的分析。最乐观的说，女同性恋者的诉求被认为是对她们权利的认可。但对我而言，这仍是不够的。

2005年，最终版本的世界女性人道宪章中并没有收录作为世界游行的成果“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尽管它被写进了初稿。你能说说这项提议为什么没有被收入在最终的文件中吗？

在2005年由ILGA发布的新闻稿中，我们必须注意到政府并没有要求我们改写宪章的文稿，是在2004年参与我们国际会议的组织要求改变这项的。我们选择的以下途径：我们期待得到共识，也希望宪章能尽可能的代表所有参与游行的女性们。一些非洲的参与者以他们退出为威胁希望我们不要保留相关文字。在辩论的结尾，我们同意了现有的宪章版本。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基于以下前提，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有趣：每一位女性，每一个人应该能够选择她们的性以及共度终身的人。这是一个有普遍性的观点，因此我们也能把它沿用到性取向的问题上，包括拥有一个经过主观选择的性，结婚与否，生小孩与否，以及决定人生伴侣的权利。对于很多参加游行的团队来说，这就相当于“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这个游行公开了恐同现象的存在，并谴责了它。

关于2010年游行准备的计划和行动，你对女同性恋们有什么建议？

大量认同女权主义者身份的女同性恋组织一定要参加到世界女性游行中去。她们必须让分析更深入，坚持她们的诉求和继续教育人们。我们也要同意在我们之间讨论我们对女同性恋和女权主义的见解并且公开这些讨论。我感觉我们不应局限于对女同性恋或者对LGBT人群的歧视，而是回到最根本的：我们正在塑造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世界女性人道宪章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具。它使我们能够延展对议题的分析，能同时激发对LGBT和女权主义运动的讨论。

www.marchemondialedesfemmes.org

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Irène Kaufer 对 Francoise Collin 的访问

我们觉得有必要引用“女权主义进程”里的一些节选，其中一位女权主义者已就现今的议题提出了观点。两位女权主义者之间的访问成了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和一名女同性恋者意味着什么的反思。

Francoise Collin是一位法国女权主义者学家和作家。她于197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创刊“Les Cahiers du Grif”，一本著名的女权主义评论性刊物。她发表了许多关于女权主义的文章。

Irene Kaufer是一名女权主义活动家，工会成员，生活在布鲁塞尔。她也是一名记者，小说家，写诗的人。

“人们可以注意到女同性恋者们已经迅速地从男同性恋者运动中独立出来。但是她们面对女权主义者遇到了同样多的问题。女同性恋者们应该在这两个运动间建立桥梁，但结果却在两个运动间分裂了。她们总感觉不是在为她们认为有优先权的事业努力：例如堕胎权，艾滋病等。当她们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时，她们得不到来自那些群体的支持。女同性恋者对她们的同盟所展现的团结得不到回馈。

女权主义运动确实创造了象征女性间对话的“同性恋”或“同性社会性”。但是，它只有在及其例外的情况下才给予女同性恋自己的空间。尽管“Cahiers du Grif”不久之后马上做了一期“女性中的女性”的专题，这个主题被当作一个题外话，而我们之中的一些正在经历它。

Ethel Smyth

Dame Ethel Mary Smyth 是一名英国作曲家，妇女投票权运动的领导者。她出生于伦敦，在Leipzig学习音乐。她的作品包括室内乐、交响乐、合唱作品和歌剧。1910年她放弃音乐生涯，加入到了女性社会政治工会(WSPU)，一个激进的妇女投票权运动的组织。她的作品“女性的前进”成为了女性投票权运动的主题曲。在她当WSPU的领导者时，Emmeline Pankhurst召集组织成员砸破反对妇女投票权的政客的玻璃，Ethel Smyth 和其他的 108 个成员一起参加。为此，她在Holloway监狱待了两个月。她的经理人Thomas Beecham去探望她，他发现Smyth斜靠窗户，拿着牙刷指挥，那些女权主义者在四方的监狱里边行边唱。Smyth有着对于女性议题有着浪漫主义色彩的热情。71岁时，她爱上了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感到吃惊又有趣，说这是“像被一只大螃蟹钳住了一样”，但她们成了朋友。

我甚至记得只是这期特刊的这个想法也引起了一些窃笑，其中有一篇寄给我们并被我们发表的“我是如何成为直人”的文章。它试图传达一个信息：大多数人和少数人一样都可以质疑他们性倾向的发展和动机。

如果说女同性恋事业并没有进入同性恋运动的主流，你认为它融入女权主义运动中吗？

女权主义一直误解了女同性恋事业。虽然我不愿意放任这种情况发生，我还是回想起女同性恋运动与男同性恋运动存在着巨大差异。事实上，男/女同性恋运动都是在争取对他们的性的认可。我只是在此说出我自己的见解，但不排除其他更优选项：女权主义为承认女性作为社会，政治的主体而努力。它是基于男女性别的不同。

有些人会说，就像Monique Wittig说的“女同性恋不是女人”。但是，她被社会认作是个女人也必须承担被认作一个女人的后果，比如说当她申请一份工作时，或者是当母亲(无论她同意或者反对这一点)。

女权运动一直都规避而不是直面有关于欲望和性向的议题，大多是因为这并不是任何政治决定的结果。这都不是那些“由我们决定的事”。它们来到一个女人身上，女人只能顺应它，然后再处理它，确认它。女同性恋和女权主义的分歧就在这里，她们有不同的欲望对象。如果异性恋女性对于对同性的欲望既好奇又迷惑（她们只是偶尔试验一下），女同性恋则是对于异性恋女性怎么能在女权主义讨论之后，在“敌人”的怀抱中入睡感到疑惑。父权统治和男人之间微妙的差异使得这问题显得很开放。女同性恋者一直都是统一的，异性恋者则是辩证的自我矛盾。

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分歧也是很常见的。即便一直都想要在外部寻找同盟，难道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们不是应该学习如何彼此合作吗？

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的相遇和互相承认有助于为她们所关心的事情发声，以及创造一个共同的平台。在起初的狂喜过后，无论是什么共同的立场都很难幸免于被不同、分歧甚至冲突干扰。首先，因为反对一个事物的情况会激起对此事物的分析，因而引发项目的变化，甚至是战略选择的变化。第二，被压制的人们，被相同的处境和斗争联合起来容易成为个人热情和其他人性因素的牺牲品。引用让.雅克.罗素的话：“被压制的人们并不是天生的好人。”这个现象可能在女性运动中尤为明显，因为女性运动起于一个包容一切的令人振奋的共同立场，但是其中一些群体的终极目标是理想化女性——认为女性是男人的未来。

当女性运动成熟时，它应该学会在团结中商讨差异，在混合和排外中找到一个现实的方法。不同之处虽然对女权主义者提出挑战但并不妨碍彼此间的团结。个人的仇恨是另外的事。它在当人取得权力的位置，即便是小的权力时容易出现。

由于各国女活动家们，西方的或是其他地方的，组织的各种非正规会议、活动，女权主义者在国际上建立起了团结。女权主

义者学会了在单一或复杂的空间里寻找同盟，让她们的话语被听到。越来越盛大多样化的游行见证了这一点，比如说2005年主要关注非洲的世界女性游行，又比如更学术的2004年在渥太华举行的第四届法语区女权主义研究世界论坛。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想法和行动跨越了国界而相遇、发芽。

选自“女性主义进程”，Francoise Collin, Irene Kaufer, Trace, Editions Labor, Belgique，2005年，p117-181

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运动需要再次变得激进

Ochy Curiel

Ochy Curiel是一位非洲裔多米尼加歌手和作家。她参与了几个试图用艺术作为一种政治改革的手段的社会运动。在圣多明各，她参与了一个在工薪阶层社区运作的草根社会运动。九十年代，她加入并领导了非洲女性身份议院，一个致力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女权主义组织。她的文章在多本杂志上发表，例如巴黎的“女权主义者的新问题”、厄瓜多尔的“ALAI”、里约热内卢大学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系的杂志，和其他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女权主义网站上。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女同性恋者，因为女权主义给予我理解同性恋的政治角度。我的同性恋是政治上的女权主义，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于性，就像Adrienne Rich 说的，这是一个女同性恋的连续统一体：一个为了在女性中创造一个女性世界的连续的政治行动。女权主义给予我作为一个女同性恋者采取政治行动的工具。站在一个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立场上来说，我介入的是女同性恋运动、非洲拉丁美洲女性运动以及非洲加勒比地区女性运动。

异性恋——作为一种被法律、宗教和经济支持的父权规范，剥削了女性并使女性处于附属地位。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思想表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女同性恋意味着不仅在性还是政治行动上都反对这种社会形式。它推崇多层面的女性独立，它质疑被合理化的性（异性恋），它反对家庭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反对异性恋婚姻，要从他们的圈套中跳出来。

作为一名女同性恋这本身就是一个反抗行动，但这还不够。女同性恋以及我们所知的激进女权主义受到政府掌控，这已经成为当今一个严重的问题。许多女权主义者（无论异性恋和同性恋）坚持的性别平等政策使

得更多女性开始掌权并拥有话语权。但是这个态度背后的社会政治逻辑并没有改变；相反她们上了同一辆车，她们中的一些还掌控方向，但是这辆车仍开在同一条轨道上，朝着同样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决定论的方向行进。

现在到了推行性别政策的时代了，男女拥有平等权利，对于拥护和采用这个政策的人不仅有许多基金供给，也有许多特殊的荣幸，但这并没有改变女性的处境，也没有使得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运动更强大。

我认为会议是很重要的，它让我们一直能够了解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思潮发展到了哪里并且朝哪个方向演进。在会上相见，互换能量能够给予别人力量。但这个事实有政治层面上的意义，因为空间意味着战略上的辩论、反思和定义；这是会议的重要性，能聚集如此多的能量和资源。

我希望会议具有成熟的政治性，因为这是赋予运动深度、设计出我们能认同的集体战略所必需的。但我非常担心一个压倒性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视角正被建立起来。这些视角支持的一些议题包括：介入LGBT运动会导致女同性恋失去独立空间；推行本质论观点——挥舞着女同性恋的骄傲旗帜却失去了它隐射的复杂性，甚至脱离文化现实。

我也担心现有的空间会再次被系统合理化的话语和诉求所淹没，比如说婚姻以及女同性恋者的母亲身份。这些话语和诉求没有质疑父权统治的压迫，没有分析这个系统自我合理化的文化机制，也没有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这些对于女性特别是女同

Monique Wittig

(1935-2003)

她是首批法国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活动家。她实际上参与了1970年奠定开端的活动：一些妇女将鲜花置于巴黎凯旋门之下以荣耀不知名的战士的妻子。她也参加了1968年5月之后第一个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组织 “Gounies Rouges”，她谴责了充满争议的“女性”概念：女同性恋不是女人，以及在语言中表现出来的异性恋的教条。她说她自己是一个“激进的女同性恋者”。她第一本书《L’Opoponax》（1964）得到了很有声望的Medicis奖之后，她变得非常有名。而《Les Guerilleres》（1969）赢得了最多的读者。Wittig被国际公认为一位有天赋的实验家，她的目标是“摧毁旧形式和旧的社会规范”。在1973年发行的“女同性恋的身体”，她将熟悉的人物，例如Ulyssea和Christa女同性恋化。1976年，她和她的爱人离开法国去了美国，在各大学中教女性研究和法语直到2003年突然离世。

性恋意味着什么。

深度分析在新自由主义、父权统治的情况下，我们作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和政治角度变得十分紧要。具象化一个女同性恋女权主义也同样紧迫。它不仅仅关系到女同性恋的处境和对一些权利的诉求，相反，我们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必须超越这些局限，扩大我们的责任、意愿和创造力，从而使女权主义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力量，采取一个更激进的立场，从中发展出新的政治行动也变得很紧急。

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性的多样化、关注度、身份以及女同性恋的骄傲，因为这些方法在需要更深刻的变化时显得不值一提，尤其是想要改变世界。

如果我们局限于身份的议题，我们将不能够影响种族主义、异性恋这样一个系统。作为一个社会运动，我们必须设立摧毁给周遭世界带来暴力的系统和机制的目标。

有关身份的政策是个必要的坏措施，它让你承认你自己，因而接近那些相同的女性，但是那些女性却不是传统意义上完全相同的女性们。很明显的，一位黑人女性身上有些元素和我的相同，我身上的元素也有和她相同，因为种族主义以相同的方式影响着我们，这使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和女同性恋者一起组织起来，但我们心里很明白这只是关联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的手段，其本身不代表什么。我可以做一个骄傲的女同性恋者，一个骄傲的黑人，但这种骄傲并不一定会质疑异性恋霸权，或是结构性种族主义。

为2004年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六届拉丁美洲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会议（EFLAC）准备的文本。全文可见网页：http://www.rebelion.org/

非洲女同性恋联盟

我们应该赞赏这个出色的联盟组织，它召集了来自11个横跨了西非、东非和南非的国家，包括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纳米比亚、南非在内的13个LGBTI和女性组织。非洲女同性恋联盟建于2003年，意在支持女同性恋者争取平等的独立，是非盈利组织。它是第一个涵盖整个非洲大陆的，为推进女同性恋平等而存在的NGO。但不是所有的成员组织都将自己定义为女同性恋组织，例如在尼日利亚，女同性恋是会被处以死刑的。好的方面是我们看到在其他国家，例如肯尼亚，我们看见出现了许多由年轻、有激情的活动家组成的组织。

13个成员共同决定联盟的项目。这个联盟自我定义为激进的女权主义。它的六大目标体现了它的自我定义：

- 通过同非洲及国际上的机构和同盟战略性的合作，推行和游说非洲女同性恋者在政治、性、文化、经济上的权利。

- 在非洲根除对女同性恋者的偏见的歧视。
- 通过研究、媒体、文学和参与地方性及国际性的论坛，建立和加强女同性恋者的关注度与话语权。
- 培养非洲女同性恋者及我们的组织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利用激进女权主义分析的能力。
- 建立强大的，可持续的女同性恋联盟来支持各个非洲国家为女同性恋议题工作的全国性组织的发展。
- 支持这些全国性的组织在之前提到的各个领域的工作，包括推动非洲女同性恋者的个人成长和对她们所属组织的能力培养。

www.cal.org.za

伊斯兰教是女权主义吗?

Toni Kasim

在2006年三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23届ILGA世界会议上，Toni Kasim解释了在伊斯兰教统治下的国家如何做一名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

Zaitun Mohamed Kasim是一位马来西亚人权和女性权利的活动家。她投身于许多活动：电影、电视、戏剧、人权倡议、伊斯兰教、反抗艾滋病等。她的知识领域以及二十年的专业经验涉及从消减贫困到环境议题，灾难处理的健康议题等。作为马来西亚“伊斯兰姐妹”的成员，Toni Kasim致力于全面消除歧视。她于1999年成为第一位独立参选人。对抗癌症几个月后，她于2008年6月4日去世。

“着眼于未来走向，我们有三个主要措施。一个是融入宗教的框架中。仅仅说‘宗教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为什么还要加入宗教的框架中？这有什么意义？还是退出吧。’是不够的。这样的争论经常出现在基于宗教的女性组织和非宗教的女性组织中。尽管如此，你可以说，对一些人来说，这的确是重要的。比如说在英国，女性穆斯林完全能够使用民事法庭，但她们仍旧拒绝使用。有些东西挡在了她们和民事法庭间。因此，仅仅说‘法庭在那儿，去用它们’是不够的，那些女性们想的是‘上帝说我不应该去’或是‘上帝说这去民事法庭是穆斯林男性的权利’。我正是因为这个而觉得参与到宗教的框架中是重要的。参与到宗教中，你就剥夺了宗教对事物阐释的垄断权力。

我们‘伊斯兰姐妹’的方法是夺去‘伊斯兰教说...’的权利。’伊斯兰教说这个’，‘伊斯兰教说那个’经常被拿出来说事。但是伊斯兰教其实什么都没说。在

每一个环节上都有人为的干预。你必须问对方：‘伊斯兰是谁？’‘这是谁的阐释？’‘这样的阐释保障了谁的利益？’。每一种阐释都是以下三个因素的结果：社会历史原因，阐释的语境以及多种阐释方式。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

许多诋毁我们的人说：‘你们不能带来多种阐释，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伊斯兰姐妹’正在这个话题上努力。我们做许多的调查研究、进行媒体宣传、出版刊物、通过公共演讲来扩大研究和讨论的主体，但这既不能离开人权的话语也不能离开民主化的话语。

我们也不能和女权主义运动分离，我们注意到这是我们力量和重要的来源。这项运动也离不开国际政治。另外，我们也要看我们是与其他社会运动要如何合作。光谈LGBTIQ是不够的。更有用的是，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平台来让更多的人参与。比如说，宗教信仰组织、非宗教组织、LGBTIQ组织、女权主义组织，而人权组织能贯穿统领所有这些组织。当然，抓住本身已经跨界合作难以分家的情况，并思考双方如何互相支持也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2003年在马来西亚，一个窥阴癖的群体作案被媒体曝光后，LGBTIQ受到处罚。他们其中的一些受到攻击。作为回应，我们和人权委员会一起安排对策，我们同人权组织一起想办法。

第三点关于道德管束。我把这叫做‘胯部监管’：他们对于你对你的胯部做了什么，你和谁做,你是怎么做的，十分感兴趣。...让我给你讲个故事。警察突袭了马来西亚的一间俱乐部。他们将在场人员分开，穆斯林一边，非穆斯林另一边。如果你不是穆斯林，你可以继续狂欢，如果你是穆斯林，就被抓上卡车。所以，已经有了穆斯林、非穆斯林的差别。你还有可以去收留所，因为还有另一个分组:男孩儿站一边，女孩儿站另一边。男孩儿做酒精测试，女孩儿就穿戴整齐地走来走去。这都是宗教信仰所致。你们可能听说过，马来西亚的同性恋酒吧受到特别关注。警察装作在查营业执照，但我都没清楚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对于宗教信仰上的少数者而言，处罚十分严重也很明显。我们的回应被我们对这种情况如何建立，引起争论，被产生影响力的理解而影响。

为了朝我们期望的方向走，我们必须有一整套对策。这听上去很空洞，我们必须告诉你我们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必须定义以及推广性的多样性。但是，在马来西亚用LGBTIQ的语言简直就等于自杀。现阶段还不适宜在伊斯兰教里谈论LGBTIQ。但是不用LGBTIQ的语言，不代表我们不能谈论它。否则的话我们在马来西亚就什么也做不成了，显然，我们已经做了许多了。我们通常都采取性别／性／人权和伊斯兰这样的思路去谈论。那实际上是一种更安全的做法。实际上，从我们易被攻击的特性以及我们所承担的危险来看，从人权，性别，性的角度来谈论通常更有力，但也不疏离宗教的框架。圣经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里面的文书。就像一位犹太学者说‘问题不在宗教，而是人们的虔诚度。’”

一位年轻运动型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见解

Patricia Curzi 对 Kamilia Manaf 的访问

Kamilia Manaf是一位近30岁的年轻的女同性恋活动家，拥有公共关系的学位。她在印度尼西亚女性期刊基金会做了两年电台记者。2006年，她成立了Institut Pelangi Perempuan印度尼西亚女同性恋者青年中心，现任执行董事。2008年1月，她被选为ILGA亚洲区的董事会成员，代表LG-BTIQ亚洲青年。她关于女同性恋的性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发表于“Pelangi Perem-puan”（印度尼西亚年轻女同性恋作者的短篇故事和诗歌集）以及其他印度尼西亚女性刊物中。

你从穆斯林人口最密集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来；我们想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指阿拉伯世界和伊朗。这能否说明跟其他国家相比，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更为进步?

印度尼西亚是个非宗教国家，政府和宗教是分开的。它是个很大的国家，人口有2亿5千万人，大多数是穆斯林。经过1998年由经济问题引发的骚乱之后，原教旨主义运动有所增加。因为我不太知道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情况，我不好将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相比。有些原教旨主义组织对LGBTIQ和女性权利非常有攻击性。有时候他们以伊斯兰教和道德的名义用暴力攻击他人。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地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把伊斯兰教当成取得政治需求的手段。我通常说“原教旨主义者”不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因为他们做的根本和伊斯兰教无关，多是政治和权力。

我参与了几个女权主义或LGBTIQ的论坛，人们总说伊斯兰教是女权主义者和LGBTIQ人群权利的主要障碍。这么说令人失望，听上去像是有伊斯兰恐惧症。其他的宗教也是反对LGBTIQ以及女权主义议题的。我觉得关键不在宗教，而是原教旨主义者利用宗教取得政治对策和权力。

911的悲剧已经改变了世界，它将伊斯兰教带入公共视野。我想要强调伊斯兰教义里面的和平和宽容。

我想说伊斯兰教义的精髓是要人们充满人性、尊重和深深地对人类表示敬意，无论宗族、肤色、社会地位、性别身份、性倾向的不同。只要性别身份和性取向是为了分享爱而不是暴力，它就是符合伊斯兰宗旨的。从另一方面说，那是一个讨论，每个人都有权利说自己想说的。我们要理解有的时候异性恋者只是无法理解LBT女性的议题。实际上，许多LBT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的性倾向，性别身份因而有恐同症。

我在许多论坛上谈论过女同性恋议题。我收到过多次关于女同性恋和伊斯兰教相关的问题。我需要做的就是告诉与会者尽量问问题，别担心会伤害到我，而且我试图把它说得轻松有趣。我认为LBT试图把它说得轻松有趣。我认为LBT女性需要学会“有趣的政治”。我们都知道Ellen DeGeneres是一位出柜了的女同性恋艺术家；因为她的笑话和知道如何让事情变得轻松好笑，她变成了美国甜心。她非常擅长向异性恋者们谈论自己作为一位女同性恋的种种。

分享一个我个人的经历，我有一次参加印度尼西亚东帝汶青年女权主义者论坛。与会者有些是穆斯林，他们带着头纱。在我介绍自己是个女同性恋者后，有些人开始对我窃窃私语。论坛协调人员决定要举行一个对女同性恋的公开讨论并邀请我参与。我试图把讨论变得充满趣味。令我惊奇的是，这个讨论延续了4个小时，而且它的确变得非常有趣！那场讨论之后，每个人对我都友好了许多，我与其中的一些仍保持联系。

你和你所组织的彩虹女孩研究所（Institut Pelangi Perempuan马来语）参与女权主义组织在女性中推广运动。女权主义和运动有什么关联呢?

运动对于身心健康非常有益。它帮助我们舒解压力、化解愤怒和抵制抑郁。很多社会活动家们累垮了就退出了他们的事业，因为他们工作太努力了，没有给予自己的身心健康足够的关注。活动家们需要去运动，把它作为一种保持健康、轻松愉悦的手段，从而能对事业坚持投入。运动也是动员和把女性组织起来的好工具。女权主义者应对发明新的组织的方法有灵活的态度。

社会运动不仅仅是会议、工作室、培训和小组讨论。运动能成功给女性带来力量。彩虹女孩研究所里的羽毛球俱乐部是我们组织创造安全的空间，互相认识、组织活动并创造姐妹情谊，也是培养特长和自信的方法。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讨论，分享他们的经历互相支持。这是一种建立姐妹情谊的方法。

运动也是正面、有效地处理愤怒的方式。加拿大多伦多“塑造生活”的拳击项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服务曾被性别暴力所威胁而处于极度愤怒状态的女性和变性受害者。运动对于暴力产生的影响有着非常好的治疗作用。这个拳击项目不是为了要伤害别人，它是把愤怒转变为增加自信和力量。在肯尼亚，Biti项目用足球集合年轻女性。通过足球，他们介绍了一些议题，比如说健康，性。

结论就是运动能够创造安全的空间，它并不会花费很多，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动员别人的策略。

有些数据显示，LBT女性过着比异性恋者更不健康的生活。她们很少运动，抽烟，喝更多的酒，饮食不正常。你认为运动能成为特效药提高LBT女性的身心健康吗？

运动能非常有效地减少抽烟和饮酒。我有些怀疑你提到的数据，因为我认识些更少运动的异性恋女性朋友，她们也喝得更多也不正常进食。反而，我认识很多LBT女性，她们是很好的运动员也非常健康。我怀疑数据是不是另外一种对LBT女性的偏见。

就你个人而言，谁是你的运动偶像？为什么？

我的运动偶像是Martina Navratilova。她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女同性恋可以像异性恋一样优秀。她帮助我们消除偏见，给女同性恋者正面的形象。2000年，她被“网球名人堂”评为世界最佳网球运动员。当她决定出柜的时候，她知道这将对她的国际网球运动员事业不利。但这不影响她的技术，她仍是单、双打记录的保持者，一共赢了345次。作为一名退役的网球运动员，她非常积支持LGBTIQ的维权运动，利用她的影响力领导了一场为同性恋雇员取得平等权利的宣传运动。她宣扬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自由言论和生活的权利，无论什么性倾向。是的，Martina Navratilova是我的运动偶像。

欧洲女性游说 (EWI)

这是欧洲欧盟中最大的LGBT组织女性联盟。它意在欧盟国中推行女性权利以及男女平等。EWL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女性经济社会地位、女性在决策层中的位置、对女性的暴力、女性的多样化等议题都很活跃。它的秘书处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www.meemgroup.org

女同性恋书写自己历史的重要性!

Helen Ibry

Arcilesbica是一个全国性的意大利女同性恋组织。它于1996年成立，由几名女性包括一名跨性别女性组成并领导。它团结了意大利各地区20多个地方性组织，是一个政治上、文化上反种族主义的女权主义组织，它倡导让女同性恋者们融入社会。它一直在争取平等权利，使民间团体得到法律认可；它采取政治行动并通过在工作、健康、教育方面的良好表现来反对各种程度的恐女同症以及性别歧视。它与LGBT组织和女权运动合作行动。Arcilesbica还是欧洲女性游说的一员。Arcilesbica网址：www.arcilesbica.it

“在2006年，Arcilesbica开始了对意大利女同性恋运动历史的调查和宣传。之后跟进了“不在那儿的历史——意大利女同性恋历史”会议以及后来的刊物，后一年又有相关的进程。我们开始认识到对过去三十年间我们国家女同性恋运动的历史总结的缺失。我们的目标是收集并宣传最近三代活动家们的经历，使得当代女同性恋身份不会失去它的里程碑事件和重要历史。当女性力量的声明被遗忘时，每个女性都会变得更微弱无力。

项目的成功得益于许多文化、政治背景不同的女性学者的努力。历史学家或原组织内负责文化活动的女性在项目中负责具体的分析工作。为达成传播知识的目的，项目对所有需要仔细检查的经历采用专业的调查方法，还多亏了学者们综合能力的贡献。他们采用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而不是那种只有专家和资深活动家才能理解的语言。对于“女同性恋定义”和决定要做集体调查是出于历史调查方法论上的考虑，这使得我们能够比较不同时期的现实，评估三十年政治历史的发展。

可以说，意大利女同性恋运动起源于1970年代。作为女权主义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的一部分，意大利女同性恋运动与这两个运动的连结一直在延续，但女同性恋者们参与创造了她们自己的独立组织。这份历史背景总结强调了对陈词滥调的质疑，挑战女性间爱恋的禁忌，还强调了自由、创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公民权利的追求。

这20篇文章粗略介绍了诸多组织的历史，她们与其他运动、媒体、政党和各机构的关联，她们的目标和关键词，她们的冲突，她们的理想，自我定义，组织程序，所用的技术，她们的可见度，性以及对性的理论，以及一些理论阐释。作者研究了这场运动涉及到的出版社、媒体（刊物、网站，联系人）、它的文化产品（电影、剧场、文学)和它采纳、引用及自创的理论。历史知识对激励年轻的女同性恋者们是必要的，这能为有志投身政治的女性提供精神食粮，并防止对女同性恋经历的简化。”









联盟与运动

现在大家都承认女同性恋是和女权主义者们及男同性恋一起奋斗的，但女同性恋者们也一直参与其他许多运动。这证明了她们对于权利平等和歧视有着比性取向更广泛的认识。有些反抗种族隔离，反对LGBT运动里的种族主义；有些则是为她们地区的和平努力；另一些加入了其他受歧弱势族群。这些工作都为提高女同性恋者及女性总体的处境。我们以这些看来是革命的理论给社会运动一点空间，比如说对性倾向和性别身份定义有重大影响的激进女同性恋和酷儿运动；另外一个需要强调的主题是：虽然我们收录了采用女权主义视角的跨性别女权主义组织，但女同性恋运动和跨性别运动间关系仍然困难。我们收录了发表于2009年3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4届美洲加勒比海女权主义者会议的跨性别女权主义陈述，希望它能激励世界其他地区的跨性别组织。以上谈到的所有话题都有自己的章节。我们自信这些文章会引发你的好奇想去继续了解，也帮助你明白这些社会运动的复杂性。

女同性恋权利的主流化

Helen Ibry

在2008年11月威尼斯第24届ILGA世界会议上， Gloria Careaga是女性会前会议小组讨论“游说：在人权角度下女同性恋运动的融合”的演讲人。她谈论了女同性恋参与人权运动的情况，比如说2001年召开的种族主义会议，并概述了一些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对我而言，强调（女同性恋）在2001年德班召开的种族主义会议的辩论上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尽管这个问题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被讨论过，但将种族主义歧视和性倾向歧视一同包括进来非常重要，因为有时我们都忘了歧视还可以是关联到其他社会议题的。

(…)我想说说这个活动非常重要的几个地方：首先，我们建立了非常广的联盟。当我们说要建立联盟以及和谁建立联盟时，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谁。例如说，我认为我自己是左翼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这并不说明参加左翼运动的就是女权主义者，或者没有恐同症的；或者说女权主义就没有恐同的，没有阶级主义，或者保守主义；这也不说明我们女同性恋者都是完美的。我相信我们必须这样做——支持多样性。如果我们反对歧视，我们就要承认在我们参与的每个社会运动和活动的每个空间里都有多样性的存在。在德班建立的联盟非常重要。从我在拉丁美洲的经历来看，第一次当地的社会运动支持了女同性恋倾向的倡议，我印象非常深刻。是的，第一次非裔运动接纳了有关性倾向的部分。我相信我们应根据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来逐渐建立联盟。但我们也承认，歧视的确存在于世界上：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恐同症，就像我们知道恐同症在我们中存在，然后我们要建立联盟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已准备好支持我们，我们一起前进。就这样说来，无论是什么领域都有建立联盟的可能性。

在我们面前的挑战还有哪些？一方面来说加强在建立联盟过程中不同运动的联系，不一定是要和他们建立联盟，而是根据每个主体的不同持续地建立联系。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要变得越来越专业，有持续发展能力，并主动参与各种活动。一般来说，我们的斗争都从我们的身份开始，但我相信我们必须向前一步，定义我们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公民，有劳动权、受教育权、住房权。这就是说，不仅要根据我们的身份行动，还要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着手。这个方法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设定一个更强大的计划，一个能让我们在不同空间都活跃的计划。

多重身份，多重歧视

Patricia Curzi 对 Phumi Mtetwa 的访问

Phumi Mtetwa，南非黑人社会活动家，对于南非种族隔离的现实非常了解。她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运动中非常活跃，后来决定将精力集中到联系LGBTI和其他社会、政治的正义上去。她在1999至2001年担任ILGA联合秘书长，随后来到厄瓜多尔。7年中，她非常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包括世界社会论坛、LGBT南南对话、社会运动全球联网。2007年7月，她回到南非，开始担任男/女同性恋平等项目的主管。她参与了多种社会活动倡议，比如说Amandla Collective www.amandla.org.za 以及另外一些在南方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进步社会活动家的倡议。

短短20年间，你经历了种族隔离的斗争，体会了废除种族主义社会系统的愉悦和生活在新生民主国家的热情，可能还有因为之前困苦斗争而产生过高期望之后经历的失望。作为一名女性，一名女同性恋者，经历这么沉重的历史是什么感觉?

种族隔离是一个艰难的现实，一项践踏人性的罪，南非黑人不仅遭受排挤，还有许多人失去了生命，这样的现象在今天的南非仍能见到。经历了种族主义压迫的反抗让我明白了基于身份多样性的歧视和排挤。之前我读高中的时候参与女同性恋的抗争是个很大的挑战。那些经历正是促成我今天继续在争取正义平等的广泛努力中提出性的多样性的原因。

南非非洲人国际大会ANC，尼尔森.曼德拉的所在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革命性的社会运动，但在运动开始时，男/女同性恋权利没有包括在运动中。是什么使ANC运动对男/女同性恋者权利改变了态度?同性恋者是如何在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发挥作用的?

毫无疑问，同性恋者积极参与到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特别是ANC，很大程度上改变ANC内部对性倾向问题的立场。在反种族主义斗争中，有一些著名的同性恋者，但他们没能进一步把性的压迫和种族的压迫联系在一起。因此，ANC下令在种族隔离的政府压迫下不应该有人再被歧视和排除在外。请记住，在南非，同性恋也依然被迫害和监禁。

你作为一名黑人女活动家参与了许多国际会议，包括2000年对北京行动平台的总结和评估，以及2001年德班反种族主义会议。现在回顾起来，这两个国际主流活动对女同性恋和LGBTI运动带来了什么?

毫无疑问1995年的北京会议和2000年的回顾更好地推进了女性的人权；因为南非新总统Nkosazana Dlamini-Zuma和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女同性恋的权利问题也充满希望。说来讽刺，现在我们国家政府在国际上，例如说联合国，开始反对一些维护LGBTI权利的原则。

反种族主义会议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特别是我学到了原先社会活动中的一些盲点，比如我们没有把多种歧视和排外联系起来。LGBTI这次与会取得的一个正面结果是将他们的事业定位成一个为了许多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而起的社会运动，把LGBTI人群融到这个框架中。我们打开了视野，提高了意识，也和许多本不可能建立联盟的人建立了联系，比如说和土著人，特别是美洲的土著人、非裔后代、吉普赛人等等。现在的挑战是如何保持动力，加强一个真正的跨肤色、种族、性和阶级的国际社会运动。

南非的宪法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妇女和女同性恋强奸率最高的国家。这两者的差别应该如何解释?

有一些数据能说明一个国家经历极端的社会经济危机。特别是过去五年里，穷人和工薪阶级在一个被边缘化，拥有极少社会资源，处于弱势地位的循环里。从这样的情况里生出了一些意识形态，同时各种反应也应运而生。意识形态例如说新教会主义，回归传统、伦理、部落生活、保守的道德观等等；而多种社会反应，一方面社会团结，人们拥有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带来了犯罪、家庭暴力、贫困、疾病和无知。

在南非对女同性恋的强奸针对男性化的女同志，她们越过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我刚刚说的可以解释这个。我们的司法系统无法很好地处理犯罪案件，这说明我们的改变还没有真正开始。LGBTI和一些女性和人权组织，同时来自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持正在宣传反对这样的情况。他们宣传反对的对象包括司法系统，一些强奸和谋杀常出现的社区，他们展开一些提高意识的活动来建立尊重多样性的社区。这是个持久艰难的事业。

你在厄瓜多尔住了许多年，现在又重新回到南非。在你最了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女性有什么不同?

有些类似处可以归咎于全球南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共同点。全球南部有较高的贫困率、失业率等等。因此，LGBTI处在这个现实里面，经常为平等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提高而做斗争。另外，有人用宗教、文化、传统作为原因来排斥LGBTI人群也是一大挑战。

好的方面包括有活力、创造力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LAC），他们把性多样化的议题放进了更宏大的斗争中，为了取得主权、社会正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分类的替代品，把LGBTI人群变成商品的资本主义系统也遭到了社会运动的反对。这是一个创新。

在非洲我们面对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上个十年以及完成的挑战。我们还在组织建立社会运动，我们中的一些人感觉到在LGBTI组织里建立可见、清晰的联系和调整也很重要。在南非，LGBTI人群和组织除了在女性和反暴力运动中活跃之外，在其他进步的社会运动中并不很活跃。我们看到了一些收获，但真正展现LGBTI组织的社会力量还需很长时间的努力。

如果时光倒流，根据你现在的经验和知识，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哪些错误是你不会再犯了的?

我觉得在我人生里犯的所有错误都是值得的，他们教会了我许多做社会活动的价值和规则。我希望这股冲动和视野能够被更多的参与者共享。那样的话，我们就能保证在运动过程中各个活动家状态良好，拥有共同的目标也能促进好的结果。在南非，我们面对巨大的挑战，例如说给年轻一代传授经验，特别是没有参与到反种族隔离运动中的年轻人，发展出新的具有创造力的技能和想法，建立一个真正连接不同代人之间的社会运动，能意识到对多样化、多层次的挑战。

Audre Lorde

(1934-1992)

美洲加勒比黑人，女同性恋者，母亲，战士，诗人，杂文家，小说家，老师。她政治上活跃于平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她参与建立了“厨房桌子”，有色人种女性出版社，美国80年代第一家为有色人种女性服务的出版社。她为一个女权主义运动宣传，注意到了种族和阶级；她指出了种族，年龄、性别、健康（她患乳癌多年），对一名女性的重要性。她认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症都与无法容忍差异有关。

这样的批评把女权主义扩展出了白人学术界的女权主义，创造了“黑人女权主义”。她的诗歌有自传性质，生活对于文字很重要。她不仅关注女性群体间的不同，也关注个体的不同。她形容自己是女性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一个不同声音的音乐会。

从联谊社交到全国性、国际性行动主义

Patricia Curzi 对 Akunyi Margareta Ocholla 的访问

行动中的少数派女性（Minority Women in Action,MWA）建于2006年，在2007年1月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前几个月由肯尼亚年轻的社会活动家建立的。它是一个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双性别女性的组织。

Akinyi Margareta Ocholla在MWA成立之后加入。她负责“更安全的性”的项目，为和同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提供指导，同时她也合作组织了每月为LBT女性展开的电影俱乐部。另外，她也负责和别的组织和其他项目间的交流，金融和创意。

你是如何开始你在“行动中的少数派女性”的工作的?

一开始，我就是想做一名社会活动家。2006年，我被邀请参加GALCK（肯尼亚男/女同性恋联盟），突然我发现自己不仅和女同性恋们在一起，还有男同性恋和跨性别者，这感觉非常特别！会议结束后，我受邀担任新成立的肯尼亚男/女同性恋信托（KEGALE）的一位受托人。加入MWA最初是为了社交的目的——看电影，和LBTI人群聊天——但是MWA发展得很快。它已经有了一份宪章草案，接下来就要成立筹划指导委员会，后来我们在2007年成立了。我被选为财务官，还志愿担任公关与创意协调员。因为我发现自己很适合做这样的工作：我目前为LBT女性协调组织每月一次的电影俱乐部。从那时开始，我就再也无法退回到以前了。当我充分享受着这份在MWA里非同寻常并充满惊喜的工作时，社会活动精神也正悄悄溜进我的身体。

我向父母朋友出柜的经历并不轻松，我知道许多其他的女同志经历的比我更难，所以我很早就意识到肯尼亚多数人们对同性恋有着极端的偏见，特别是因为他们对此知之甚少，也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仅仅在一年之内，我就能放手大胆对内增强MWA的实力，并向世界社会论坛的成员公开谈论同性恋，还在国家艾滋病控制委员会的HIV会议、Hatua电视脱口秀和开普敦AWID论坛上谈论同性恋。

作为GALCK的成员，你在2007年1月的世界社会论坛上非常活跃。这个全球范围的活动对“行动中的女性少数者”组织有什么样的影响?

参与世界社会论坛的女性们学到了怎么样处理公众提出的不同问题。她们也得此机会听到从东非或者世界其他地方来的社会活动家的情况，这让她们消除了孤立感和恐惧感。MWA的成员也了解到如果你对大众媒体或记者的问题处理得措手不及，你的所作所言很有可能会反过来给自己设下陷阱。你经常会遭受到间接或直接的后果。因

此，这是MWA在今后工作中必须注意的。但是，MWA成员同时发现她们应变能力极佳——即便事情没有按照原计划走，她们也能上手。总体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它开始讨论原本是社会禁忌的话题。

在GALCK的努力下，在肯尼亚已有LGBTI组织的情况下，是什么促使了专注于LBTI女性组织的创建?

MWA的建立者原是想加入男同性恋兄弟组织，但是时间一长，她们感觉男同性恋和LBTI女性间有些问题必须分开，区别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独立的组织成立了。另外，LBTI女性的确需要私密空间来自在讨论自己的议题。

你的组织和HIV/AIDS、女权主义、人权和LGBTI组织合作。和这么多伙伴和盟友工作，你不担心会失去重心吗?

所有这些议题都是相互包容的，没有哪一项比另一项更重要，但是由于MWA能力有限，我们不能给所有问题以同样的精力和时间。一开始，我们专注于完善自我，增进我们对人权和同性恋的理解。之后，或者说因为前面的这些工作，我们对女权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基于此，MWA成员能够为HIV/AIDS和与此疾病有关的问题工作。因此，我们总是从自身出发，向外伸展。许多LGBTI人群专注于其他方面；而MWA能从他们那儿学到不同的事情，也可以分享我们的经验。

你参加了2008年11月的AWID女权主义论坛。你作为一位年轻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被女权主义的大人物包围着是什么感觉?

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不管是巨人还是平民，被这么多女性围绕的感觉真令人兴奋！很明显，我有许多需要学；但我也有许多想要分享。在AWID论坛，非洲女同性恋联盟组织的工作坊里，我谈论了我国的LBTI人群情况。在肯尼亚LBTI社会活动的问题是，没有很多LBTI女性愿意和你公开讨论，尽管她们饱受偏见与歧视之苦。因此，你必须不仅仅代表你自己发言，也代表着另一些人。有时候，这是件麻烦的事情，但它使你个人得到成长。

你成长中接受了两种文化，一个从北方来，你有个瑞典妈妈，另一个从南方来，你的肯尼亚爸爸。另外，你定义自己为年轻的，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你是如何处理这多种身份的?

我从很小就学会了融合我的两个文化背景。它们并不冲突，相反，它们互相补助。我在瑞典和肯尼亚都像在家一样。因为我的语言和想法也是英语、瑞典语和Kswahili语的结合，有时还会掺进点法语。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绝对的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两个种族背景的年轻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也就是说，我并不看重他人对性倾向的接受度以及别人如何看我。有些人无法理解我从哪儿来，想要把我归类；但这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些身份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分开的，因为它们是彼此关联的，这才是我之所以为我的原因。

非洲女同志赞扬之歌

Elizabeth Ikhaxas

Hella…hella
我们的女儿已回家
Hella…hella
被丢弃的正是家
让我们在今天舞动和欢聚
让不欢迎我女儿回家的人感到羞耻
非洲!
为把我女儿认作这片大陆非亲生女的人感到羞耻
女同志，男同志，跨性别者，双性恋，异性恋
都是女神的图像
非洲的儿女
天神的女神!
被宠爱着，确信没有什么能够将你和所爱的自己分离
没有恐同的独裁者
没有拒绝的父母和兄弟
没有宗教
没有性犯罪
什么使你如此之久才找到家，女儿?
我们为你准备了盛宴
让全世界都关注
我们的女儿已到家
女同志
非洲女同志
Sela…sela….
非洲
欢心!

选自纳米比亚女性写作“在昨天和明天之间”，Windhoek, 纳米比亚，2005.

在和平进程中为全球合作打基础

Marie-Paule Lolo对 Aswat 的访问

Aswat，巴勒斯坦女同性恋们，由于其在所属地区的出色工作，成为第一个Go Visible奖的获得者。第一次颁奖与2008年1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23届ILGA世界会议同期进行，这个奖项由Ulrike Lunacek发起并捐助，他是奥地利国会成员，欧洲绿色党的发言人。

Marie-Paule Lolo，法国人，女同性恋者，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她是法国绿党LGBT委员会的合作代表。她还是一名心理分析师，现在为一家比利时组织做冲突预防的工作。她在2008年12月对Aswat的一位成员进行了采访。这位成员要求匿名以保证她的安全。

你们组织得到了第一个"Go Visible奖"。你为这个奖项呈现了什么样的项目?

这个奖项为了肯定推进LGBTQI工作的团体而设，这些团体除了要有对当地或世界LGBTQI人群有影响外还要有常规活动和项目。Go Visible奖肯定和鼓励了Aswat总体的工作而不是具体一个项目，这肯定会提高Aswat的受关注度，为它在当地和世界上创造更多的机会。因为这个肯定，Aswat真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女性在LGBT会议和活动上被关注，尽管更多的是世界性的活动而不是当地活动。我们毫不怀疑我们今天收到了更多的关注。

Aswat希望能感谢Ulrike Lunacek女士，感谢她在会议上的投票，希望她能带领其他人一起来承认和鼓励世界各地的LGBT组织。

你能解释一下在如此艰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里，有着双重受歧视的身份——既是一名巴勒斯坦人又是一名LBT女性，你是怎么生活的?

身为一名巴勒斯坦女同志，我们受到三重的压迫：压迫来自在以色列生活的巴勒斯坦公民——这是个天生的少数国民，压迫来自生活在保守父权统治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区域，压迫还来自一名女同志生活在一个极端恐同的社会。但是，Aswat用勇气和坚持来面对这些挑战。就像一位女性说的："在Aswat出现之前，我躲在黑色的柜子里，为我的"怪异"感到羞耻和罪恶，但是现在，我感觉骄傲，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分享、学习和为我自己和其他女性做贡献"。Aswat帮助许多女性成长，鼓励和创造了女性领导力；给了女同志们力量，也向大众提供一个看待巴勒斯坦女同性恋生活的真实视角。

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面临政治挑战和歧视，我们由于是少数国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差距，我们试图以女权主义者、女同志和一名普通人的身份通过社会活动来处理

这个问题。歧视体现在生活各个层面，如政府预算分配、教育和住房，不公正导致产生了一个处于劣势的、边缘化的，被孤立和被忽视的少数群体。因此，Aswat把民族斗争看作是我们争取作为一个人的平等、争取女性地位平等、争取关联的同性恋身份平等斗争的一部分。

你所在的组织与一个以色列女权主义组织一起工作。你是否认为女性更有能力建立区域和平，甚至更广泛地，建立世界和平?

当然！Aswat和巴勒斯坦犹太女权主义组织有紧密的合作，最近也积极参与计划在以色列召开的第16届女权主义者会议，这是第一次在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聚居区Nazareth举办会议。Aswat非常活跃，并同时获得了与会阿拉伯组织和犹太组织的诸多赞扬。与犹太女权主义组织合作是我们深信的一项政策——不仅仅是一个目标。可能有时，我们感到合作的“幻想”并没有在我们的社会行动的背后建立起，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女性们正在带来变化，并为所有人争取平等和正义；而且我深信女性们，尽管很慢，正在为真正的和平进程的全球参与打下基础。女性们竭尽所能，将她们能参与的事业最大化，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不仅支持改变而是带来真实的改变。

如果你可以实现一个愿望，会是什么?

人人平等，没有偏袒。我们希望更多的女同志获得安全感。我们想赋予她们处理自己恐惧的能力，再是处理社会恐同的能力。我们希望她们尽可能完满地生活，发挥她们最大的潜力。我们希望阿拉伯世界的女性能够在保守的、男性主导的、毫不允许表达自己和性的社会里生存下来。我们希望增加话语权，让女性们知道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支持她们。也希望大众能更多地听到我们的声音，告诉他们关于LGBT议题和权利。我们希望为女同志争取平等权利和获得认可。Aswat的项目和活动正是为了实现正义与平等的愿景，我们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带来改变。

法语版请访问
www.comm.lgbt.lesverts.fr

ASWAT

Aswat，在阿拉伯语中是声音的意思，一个充满活力的巴勒斯坦女同志组织。组织的存在为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社区、加沙地区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女同志创造了安全空间。组织成立于2003年，Aswat为巴勒斯坦女同志创造了发表意见、抒发感情、分享经历和化需要为行动的机会，它还提供创新性服务、培训和授权课程，为巴勒斯坦女同志提供对普罗大众的宣传和媒体支持。Aswat试图让人们有深刻的理解，将女性的多样性作为中心工作。它兼容并包，鼓励参与和合作，将社会边缘人的经历带给大家。Aswat的项目和活动通过鼓励集体行动、鼓励社会变革来应对社会不公，因为它相信正义与平等，相信为女性创造更多机从而过上完满生活。www.aswatgroup.org

酷儿，身份的批评

Aurore 对 Judith Butler 的访问

Bang Bang是一个比利时布鲁塞尔播出的酷儿电台节目。2007年5月，Bang Bang的Aurore在Judith Butler对布鲁塞尔访问期间对她进行了采访。

Judith Butler生于1956，美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对女权主义、酷儿理论、政治哲学和伦理学都有建树。她是加州伯克利大学修辞学和比较文学的教授。她最著名的著作《性别麻烦：女权主义和身份的颠覆》（1990）取得了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在你《性别麻烦》刚出版时，这本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被认为具有革命性。许多年过去了，你认为《性别麻烦》是否依然具有革命性，还是已经被大众渐渐接纳了?

(…) 《性别麻烦》对两分法的这种概念提出质疑，即对两种理想的身体形式，两种理想的身体构造：男性和女性的质疑。我建议今天雌雄同体运动也着力于批评这样的想法。不是所有人生下来就是男性或者女性的。人类身体是个连续统一体，我极力试图说服医学或精神病学认真对待雌雄同体，它涉及对二元性别系统的质疑。类似的，现在仍有极端的，甚至有时是非常极端的针对跨性别的暴力，所以我觉得“性别麻烦”非常重要，它帮助我们拓展对“性别是什么”的认识。

(…)对于性别问题采取的另一种方法，你认为新词汇能不能科学地试验和发展起来?

(…)我认为试验新词汇非常重要。新词汇以另一种方式帮助我们概念化一些社会存在。但我认为了解已有的传统概念如何定义也许同样重要，它帮助我们思考诸如身体何为男性或女性，性取向何为直人或同志。但这些分类常常无法描述我们是谁的复杂性。(…) 新的词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从来都是比这些传统的分类更为复杂。当有人说“我是同志，我是直人，我是双性恋”，他们是说他们永远是这样的吗?我认为酷儿这个词让你拥有一个有变化的人生。在其中，你可能是直人，也可能是同志，或许是双性恋或许不是。但你是一直改变的人，对吗？我们如何表述性如此复杂的生命力？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人感觉自己表面上非常男性化或是女性化，或是这些词汇都变得令人费解，主动和被动也不再是原意。但如果我们通过性来思考性别，我们就必须允许一些变化和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因此，我希望“酷儿”这个词给予人们一个不死板的身份概念，允许他们有很多的词汇来表述性和性别。

你认为酷儿太轻易太经常被使用吗？那些曾经是男/女同性恋的庆典却突然变成酷儿的了?

(…)我非常担心当酷儿变成了一个身

份。它从来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对身份的批评。当它不再是对身份的批评的时候，他也就失去了批判性的一面。

你说我们前后里外都是自由的，出生的时候没有任何规范；我们应该和社会规范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能够建立自我，做出选择。(…) 要怎么样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一个人是什么类型的男人或女人？一个人有多少的男性或女性气质？作为个人又能做什么？

(…)我认为我们能够和社会规范保持距离，但同时我们又深陷其中。(…)我们能做的选择仅限于对一些定义我们的概念做某种程度的挣扎。

因此在我年轻时，有些女同志们说“我要完全把我自己从男性化和异性恋的社会规范中解放出来”。结果，他们开始了类似异性恋男女分配角色或是女同性恋者男性化的复杂的恋情，她们感到非常困惑。要完全去除定义自己的社会规范好像不太可能。我们常常和这些社会规范做斗争。我们不可能绕过这些规范来建立自我，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况，了解哪里能下手，哪里能争取一些自由。

你也说过，这么做很危险。当生活在社会规范里面时，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当生活在社会规范之外，事情就变得难以理解，还要冒险。那么怎么样开始才能最少遭罪？

我认为有一些危险和风险是好的，应该允许我们有为对的事情冒一下险的政治；允许我们有些难理解，看上去怪怪的；允许我们冒险提出人可以有其他形态的观点。因而可能与我们可见的性别不一致。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弹性多大，或是多经常可以突破社会规范——定义什么是能够理解、能够解读的而什么不能。真正的问题是你制造这些风险的同时如何保证自己的生存？因为你必须生存下去。我认为你必须和那些和你一起冒险的人一起生存下去，形成团体，彼此团结，因此集体的力量或许能够让大家冒这个险，引来一些危险但不至于自杀式的那种。(…)

我最后的问题是关于“仇恨言论”的；在欧洲有一个社会运动意在惩治恐同言论，但它同时违背了言论自由，你是怎么看的？

(…)的确，如果一个人反对歧视性的言论，他应该反对所有歧视性的言论。他的准则应该包括所有的少数族裔。但如果是一个

酷儿理论

酷儿理论是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套理论，意在说明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不能永远的决定我们是谁。它出自女权主义研究和同性恋研究。酷儿理论建立在女权主义对性别是构成自我必不可少的部分的质疑，同时建立在同性恋研究对性行为和性身份的社会性的研究。酷儿理论包括所有的性行为和身份，不管是社会规范的还是社会异类的。它部分来自伊娃 · 赛奇维克（Eve Sedgewick），戴安娜.福斯（Diana Fuss）和朱迪.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作品，三人都受到米歇尔.福柯的影响。

少数人群针对另一个少数人群呢，我很担心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宗教上的少数人反对同性恋者们，或者是同志们反对宗教少数者。我们将人群分组，分成真正的受害者和侵害者。

（…） 我认为应该保留反对或讽刺言论的存在空间。我们需要这样的戏剧来自我嘲讽或者是深究那些刺伤我们的文字，或者是赋予他们另外的意思，或者重新定义它们以消除它们伤害人的力量。比如说在说唱音乐中，你经常会听到非常种族主义、诋毁女性和恐同的词语，但是有些情况下这些词语已经被重新定义了，没有伤害人的特质了。因此我们除了对一些言论行为的伤人特质保持敏感外，也要同样对一些戏剧的颠覆性或是解放效果特别注意(…)

残疾的酷儿：酷儿的象征

Janet Price

Jane Price：我是一名残疾的女同志和酷儿社会活动家，我住在英国利物浦。我人生的轨迹是：早先在英国的大学接受医疗训练，后在印度北部开始了女性发展和女权主义工作，后来严重的病情给我带来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我进行女权主义、身体和残疾方面的写作（还有谈论它们并采取行动！）；我和同事朋友一起在英国和印度开展关于残疾、性、艺术、教育、女权主义/酷儿政治的活动；我也珍爱与我的伴侣一同在我们的花园工作。

对残疾的挑战

我先要说说为什么残疾是一个政治议题和为什么残疾对女权主义提出特别要求。我是个残疾女性，对许多人来说，残疾仅仅是身体上的现象，一个有局限的、不正常的身体。与性别、种族、性取向不同，它们都经历了政治理解上的改革，从生物的层面到通过文字，议论和行动来建立身份，残疾还是一个自然化的非常本质的概念。

这让我想到了女权主义的几场战争，首当其冲的是不局限于生物意义上的女性，女性不单是生育机器，我们质疑生物决定命运的想法。作为一个残疾的女性，有人会因为残疾而忽略我们，否定我们的智力，否定我们参加危险运动的能力，否定当母亲的可能性，甚至否定性行为，就因为我们残缺的身体而无法完成这些。因此你会理解我，当我对你说：“我们的生活不被我们的生物性、身体或智力上的局限所决定。作为一个残疾的女性，我会持续我的争取和其他女性一样过着混乱、性感、快乐的人生。”我说作为一个残疾人，身体不能决定我们的命

运，我不是要反对我们的生物性，但是残疾形成了“残缺的身体”的形象，这种象征扭曲了其他正常的地方，变成可忽略被静音的威胁。任何残疾或者身体上的不正常都引人联系起不正常、脆弱、一个不稳定的身体。就像强制异性恋一样，我必须要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强制身体正常的世界，只有正常的身体才是正常的。女权主义者Rosemary Garland-Thomson在关于残疾的理论中写了一个我们理解中理想的正常人——白人，男性，异性恋，受过良好教育，年轻，不残疾的一个人。

女权主义运动也一样是建立在反对男性设立标准和规范的概念，作为女同志和LGBTI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反对强制异性恋；作为残疾人，残疾的女性，我们反对强制身体正常，反对因没有完美身体所带来的困难和危险。

残疾不是一个孤立的象征，它与每个人都有关。不管是由于年老耳朵渐聋，或者是癌症和艾滋病治疗的后遗症，或者由于意外导致身体功能失常，我们都得面对身体的不正常。我们离我们以为的稳定的、可控的、永不改变的机器般的身体还有很长距离，尽管我们试图通过在健身房运动，花钱做头发，买护肤品或是医学治疗来推迟衰老过程。

残疾是对西方启蒙主义身心分离观点的一大挑战，他们认为超越身体的心灵是置于一个可控制的身体里的，但是，取得永久的完美是几乎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常处临界非正常的状态，因而本是不稳定、不确定的。我们都是暂时身体正常的。残疾并不是一种只有不幸的人才有的特殊的状态，而是在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图纸中，我们如何对待残疾和他如何对待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象征，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特性。另外，通过解读残疾的身体来理解残疾是偏离正常规范的，也可用于解读性别、性、种族的情况，同理女权主义是出于社会规范女性化成为他者而不平，女权主义者和身体残疾者可以运用这样的思维来做分析或是行动。

酷儿的象征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残疾对于我们总结分析性别和性有着重要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残疾和酷儿之间贯通，因为他们都打乱了我们对于什么是正常的、自然的事的理解。这样偏离社会规范的角色对我们力量分析非常关键，对考虑文化边缘化人群要如何颠覆其所谓既定身份也非常重要。另外阶级、种年龄、身份的灵活性给了我们形成新的政治联盟的形式以及新的行动方向。如果我们让事情有些不同会发生什么？酷儿给主流LGBTI带来了挑战，主流LGBTI原本属于西方新自由主义，而酷儿的出现打乱了原本的理论框架，打乱了同性恋身份的自然化，例如那些想要证明同性恋是由于生物性原因是天生的想法。挑明酷儿身份的激进行为，对巩固同性恋身份不利，但是，这样做他们跳出了社会给予的位置。

“酷儿”和它其代表的“格格不入”的出现可以追溯到90年代的社会活动。1981年，Gloria Anzaldua 和 Cher-

rie Moraga 在她们关于有色人种女性面对压迫的文集中写道“我们是一群酷儿，一群无所归依的人，不在主流文化里，也没有自己的文化，我们融不进任何地方，正因为我们的不融，我们变成了别人的一个威胁”(1981:209)

因此，当酷儿也就意味着你能不能融入——你的出现多大程度上打乱了原有秩序。残疾人很明显的引起周遭人的不适。我们生活于种种政治文化中，想要创造统一的文化，在严格控制和没有威胁的情况下欢迎不同的文化。我们对别的文化的接受程度取决于我们屈就自身去融入其中。相反，酷儿说的是灵活性、流动性和身份改变，不以一分为二的方法来思考权利的分配。它观察权利是如何毫不留神地失去的，观察意料之外的同盟们是如何参与进来的。酷儿文化并不否认压迫的存在，人们需要直面它并与之斗争，它想说斗争有不同的形式。酷儿反对西方知识界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反对自治和超越的想法，精呼吁就事论事而不是普世的方法。酷儿是破坏稳定的身份，拒绝自然化的一分为二的权利和权威，例如说由性别、性、种族体现出来的争议比一分为二的权利复杂的多，残疾也不是正常运作的身体绝对的对立面。

二元对立的模型给了我们直观的反对的渠道——但是酷儿开创了复杂的、混合的、心照不宣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控制的文化的模糊态度，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Homi Bhabha表明的主流话语和文化间的矛盾被表达了。2008年9月利物浦举行的“哒哒巨星”演出上，残障人士表演了性感的脱衣舞；Kevin Connolly，失去双腿的艺术家，拍了一张他滑着滑板过去后，全世界都看着滑道的照片；朋克乐队Heavy Load的主唱患有妥瑞症（一种抽动综合症），他给整个画面带来一些有意无意的破坏感。这种混杂的感觉不仅仅存在于艺术和戏院里，它还出现在残疾女性生活里最艰难的地方。多年前的一场讨论中，来自印度性工作者志愿者组织Sangram的Meena Seshu (2008)说收入最高的一些性工作者是残疾女性。她们有些忠诚的客人，她们质疑男人从付费的性中想要得到什么。这些性工作者符合一些男人的喜好，因为她们和普通的正常身体不同，她们实际上是一种残疾的文化。她们迫使你在各个层面上打开思路。残疾和酷儿一样，不是直接反对权威，而是

Frida Kahlo
(1907-1954)

她是墨西哥画家与德国摄影家的女儿，1907年出生于墨西哥。不久便展现了艺术天赋和政治决心。在“Cachuchas”运动中，她为解放女性努力。两次嫁给墨西哥画家Diego Rivera, 她与几名女性也有过感情。受小儿麻痹症和之后电车事故的影响，Frida Kahlo卧床多年，行动不便。她作品反映了这样的生活，比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自画像。她1954年47岁时死于肺炎。

能通过幽默反讽、慢慢融入的方式动摇谁与我们为伍、谁与我们为敌的概念。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找到方法用我们身份的灵活性来反对边缘化，如何形成联盟使我们成为发展中酷儿女权主义残疾政治的主体。

你把自己定位在哪儿?

这篇文章是就CREA支持的女性、残疾、酷儿工作坊上的一篇演讲稿修改而成。工作坊是2008年11月AWID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社会运动力量会议的一部分。

CREA

REA是一个女性人权组织。它赋予女性领导力，专注于与性、性与生育权利、针对女性的暴力、人权和社会正义有关的议题，她使女性能够清楚表达，提出要求并争取她们的权利。http://web.creaworld.org/home.asp

女权主义运动和激进的女同性恋：令人痛楚的冲突

Dani Frank

女同性恋们在女权主义运动中一直都非常积极，但是在有些国家出现了冲突。早在1970年美国就出现了这样的冲突：女同性恋社会活动家开始抗议NOW（全国女性组织）内部的恐同人士，她们在纽约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女性国会上自命为“薰衣草威胁”，行动的结果是确定了女同性恋是“女权主义的正当关切。”激进的女同志们就此诞生。在法国，事情发生得较晚。1980年Monique Wittig在女权主义刊物《Questions Féministe》上发表了两篇文章《直人心灵》和《我不是天生的女性》。她在文章中认为女同性恋超越了社会产生的男女分别和异性恋的理论框架。这些文字触动了巴黎加希耶大学的激进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她们集会指责异性恋的女权主义者同她们的敌人——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社会合作。此事导致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的隔阂，女同志就此从该杂志中消失了。

Isabel Dargent说那场运动十分关键，女同性恋终于从女权主义的柜子里出来了。她也提出异性恋女权主义不能解决根本的冲突，比如说公开的或是私密的对女性的欺压。不同国家的女同志们扮演的女性角色支持异性恋已足够。“激进的女同志”中的“激进”是指把对女性欺压的根源连根拔起：异性恋/异性恋社交形式，男性组织和制定规则来主导女性，使女性为他们的系统而活。激进的女同性恋不只是一个关于性的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政治选择，一种抵抗男性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内的等级制度。

激进的女同性恋者很早就开始处理现在广泛被讨论的议题，比如说，针对女性的暴力，作为政治犯罪的强奸，女性健康，自我防卫措施。拒绝和男性一起是她们一个符合逻辑的选择，她们独立建立了一个自主的社会运动，属于她们自己的空间和出版社。

女同性恋复仇者

“女同性恋复仇者”是几个向所有LBT人群开放的女同性恋激进小组，它在全球都有当地分部。小组1992年成立于纽约，是“行动起来”组织的一个分支。曾有一段时间暂停了行动。

这些小组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女同性恋问题并推行自己的观点，小组将一些女同性恋者培养成富有经验的组织者，以参与到政治叛乱中。小组极度重视投入激进行动。“成为你扔出的炸弹”，炸弹威力掷向异性恋者、恐同者、异性恋规范者、古板者、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以及社会上、社区中普遍的压迫势力和机构。她们还合作参与重大事件，如每年女同游行。“女同性恋复仇者”以噱头十足的直接行动和街头戏剧化战术著称。她们招牌事件之一是在唱诵时“吞火”——“火不会吞噬我们，我们带着火，火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女权主义作为改变的工具

Lhoana Berkins

2007年9月在秘鲁利马召开的第四届ILGA LAC地区会议上，一个关注“女权主义和性的多样性”的讨论小组成立了。在Lohana Berkins的演说中，她重新确认她作为一名跨性别女权主义者对女权主义社会运动的参与和支持。

Lohana Berkins 是来自阿根廷的一名易装癖女权主义者。她在1994年建立了ALITT，1995年建立了阿根廷易装癖联盟。她组织犯人、妓女、易装癖者、女权主义者、男/女同志和低收入青年携手反抗凌辱和欺压。Lohana是阿根廷共产党员，参与组织了许多活动。她于2003年获得了国际同性恋人权委员会设立的给LGBT 民权社会活动的 Felipa de Souza 奖。

“（…）女权主义给了我们把自己当成女性来研究的可能性，它也给了我们一个世界观。在女权主义之前，女人唯一的命运就是沉默，仅仅是过日子活着，没有能力思考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环境。(…).当她们开始工作和思考，我们意识到女性在男人统治的世界里被当成了商品：神圣的商品、美丽的商品、苗条的商品。即使我们自己在组织工作坊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女性也有自己

的气味、品位、肤色和痛苦。我们也开始反思阶级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们仍相信企业家会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深印内心的幻想导致我们这么认为。

女权主义给予我们新的工具。尽管我们毫不犹豫地争取民事、政治权利，我们却不太着急争取经济权利，因为易装癖者是这场运动中的穷姐妹，我们不被认为是应赋予权力的人。我是个女权主义者，不仅仅是言论中也是行动上的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是带来改变的工具。我们在争取真正的改变，我们争取使堕胎的去罪化变成社会的优先考虑，我们也想改变权力的情况。我们确实有工作效率，不仅仅是制作演出、故事和知识。我们在重建自己的身份；我们尊重不同的想法，易装癖、跨性别以及所有她们自己文化中命名的东西(…)”

Adrienne Rich

(1929-)

美国诗人和理论家。她在英语世界的性学、种族、语言、权利和女性文化等领域的成就令人信服。她一直致力于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自70年代起活跃于女性社会运动。《潜入废墟》获得了国家图书诗歌奖：她拒绝自己领奖而是和另两位女诗人（Alice Walker和Audre Lorde）代表所有被噤声了的女性领这个奖。她的文章《强制的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是女同性恋的共产党宣言。她从1976年起公开自己是女同志，她和她的伴侣，作家和编辑Michelle Cliff自此共同生活。1978年在《共同语言的梦想》第一次直接讨论女同性恋的欲望和性。她鼓励女性“调整”和“不忠”，她广泛参与许多不同文化、历史、种族的女性经验，讨论了语言特权，男性暴力和女同志身份等议题。

在她的文章《强制的异性恋和女同性恋存在》中，她认为异性恋是一个暴力的政治机构。她鼓励女性把能量投射到另一些女性身上而不是男人，她还认为同性恋是女权主义的延伸。她质疑女性依赖男性给于的经济、社会支持，以及性生活和心理的完整性。她呼吁更多了解女同性恋的经验，一旦有了更多的了解，女性能够享受女性意义上的性爱。她认为女性未必会更喜欢异性恋，它只是被被社会赋予、管理、组织和宣传，因而保存下来了。她认为女同性恋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反抗：准确的说是反对父权和男人对女人的权利。Rich认为女同志个人历史和政治历史失去了连贯性，当说到历史，她们就是女性版本的男同性恋，毫无差别。在一段历史中，男同志和女同志在社会中合作共存，共同反抗社会；但是把女同性恋经历看成是男同性恋其实就是丢掉了自己，否定了女性经验和现实，编造了女同志史。

作为 LGBT：要不要T?

Deborah Lambillotte

Deborah Lambillotte是女同性恋间性人性别的社会活动家。在多年参与意大利组织Arcigay，Arcilesbica和ArciTrans之后，2002年回到比利时。

她现在是Holebifederatie佛兰芒LGBT伞式组织的执行董事会成员，负责跨国项目，她同时也负责“老玫瑰”的当地分部，一个为50岁以上女性提供服务的女同志组织。她也是欧洲ILGA的董事会成员和秘书长，前欧洲ILGA执行董事会联席主席。

“我是在成为我自己的过程中第一次和LGB人群有了联系。我很清楚地知道我自己是个喜欢女人的女人，但之前我的跨性别历史使其他女同志们很难接受我是个女同志或是我是个女的，她们中的一些人现在仍然不接受。（…）

（…）大多数男同志在表面上接受跨性别的人，不管男女，至少他们能容忍不多想。男同志们认为跨性别人群，尽管他们分不清烂女王和跨性别的人，是以父权思考下需要被保护的弱势群体。

男同志是男人，他们中的多数根本不花力气去了解性别身份和表达的多样性。

一开始，大多的女同志对跨性别者有所保留和有敌意。在男变女的跨性别者中，她们感到了家长式的干扰，她们不把跨性别者认作社会化的女人，而是伪装但永远成不了女人，因为她们不是天生的。

另一方面说，女变男的跨性别者被认作是叛徒，因为她们离开了女性社区。女同志社区把这些跨性别者和她们的伴侣排除在外。依我的经验看，这是因为偏见和对未知的害怕。但是女同志社区真诚地希望理解跨性别议题、性别身份、性别表达，如今也越来越多地提供辩论、工作室和对话的空间。

女性的界限
女性的男性特质

Geertje Mak

以下节选用于介绍Geertje Mak 2008年9月5日和6日在国际女性的男性特征会议上的发言，这是一个由阿姆斯特丹大学Saskie E. Wieringa博士发起的会议。

Geertje Mak 是荷兰奈梅亨大学性史讲师。她是多篇关于女性的男性特征文章的作者，也是荷兰杂志《男性化的女性：19世纪跨越性别界限》中一章的作者，2004年重新编进女性历史杂志。她于2005年在同性恋研究杂志上发表20世纪医学语境中雌雄同体的“自我”的文章，被现代语言协会的同志党团授予 Cropton-Noil奖。

“我们需要内部的男性身份才能正当拥有男性外表吗？”二十世纪初的柏林，少数跨过性别边界线的女性试图将她们的名字改为男名。在向柏林警方提出要求时，Magnus Hirschfeld，一名性历史学家研究员，作为一个专业人士见证了此事。Hirschfeld （无法实现的）指出她们生来内在的身份来试图使她们的越界正当化，但是那些女性们倾向于强调她们作为一个男人的表现非常成功。后者的论点，特别是那些女性们说她们装成男性并未引起公众哗然，使得警方承认并没有法律禁止女性越过性别边界。在Hirschfeld的科学和理论作品中，他一直寻找真正的女性易装癖者，就像男性易装癖者一样，以易装的欲望来定义自己。然而，为了帮助女性易装癖者练习，Hirschfeld自己也一直成功地易装。

尽管警方没有正式允许她们改名，但是她们拿到了所谓的易装癖身份证，上面有一个着男装的女性照片和警察不禁止她们着男装的说明。在我看来这些故事说明，一些男性化的女性成功地使用技巧避开了与生俱来的男性的“性别身份”。

跨性别女权主义宣言

此宣言2009年3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十一届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女权主义者集会上宣读。

“亲爱的同事们，

与大家共享她们空间的易装人士、变性者和跨性别女性，我们一起庆祝此会议和所有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者。

我们不是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的新课题。我们是一群多样化的人：易装人士、变性者、跨性别者、扬声器、女性、变装者、退化的器官等等，我们的身份还有上千不同的名字。我们在这儿，就像所有出席的人一样，我们都是女权主义者，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风尚。

我们是个体，有内心的力量和抵抗。我们女权主义者用团结和热情抗拒欺压我们的父权体系。父权体系有时对所有人同样欺压，其他时候以另一种方式对个人、单个男性和单个女性欺压，仅因为他们不再在父权特权的理论框架内。

我们举起了斗争的旗帜：为了堕胎的去罪化，为了决定我们身体的权利，为了我们的乐趣、性、历史和我们的身份。

我们谴责拐卖和剥削儿童。我们是在父权系统下被置于妓女地位却不愿接受这样的命运的人。我们要求被承认是劳动人口中正规的一员。

我们是兼容并包和相信平等的女权主义者，我们是自主的女权主义者。自主意味着有权利决定自己的身体，改变或是易装。

我们是女同志、直人、易装者、变性者、双性恋、跨性别和双性别人士。我们每天的行动都在反抗父权。

我们是黑人、土著、犹太人、巴勒斯坦女性。我们是妓女、穷人、农民、年轻人、老人——我们是存在的所有肤色的女权主义者。

我们反对用压制性的法律、社会规范和其他任何基于道德传统的法律将我们的身份定罪。

我们反对所有的原教旨主义，包括我们自己中那些引用生物法则即是命运的人，我们希望所有人让身体的残余，主观性和欲望退去。

我们希望我们反对欺压的历史和社会活动不仅我们自己的同盟承认，也希望获得被欺压我们的人的承认。我们也要求建立非宗教政权，因为我们知道若没有宗教，很多欺压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要求有受教育、健康和住房的权利，它们是不可剥夺的人权，因为为易装人士、变性人、双性恋、退化的器官和其他女性维权，就是保障人权。

我们感谢出席的艺术家，特别是那些余兴节目的表演者，因为幽默和不过分严肃是女权主义者的特点。

我们感谢支持这份宣言的300多位人士。”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跨性别女性主义者（The Trans Feminist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Caribbean）




HUMAN
ARE
RIGHTS
OF ACTIVIST LESBIANS

游说
女同志们在哪儿？

尽管女同性恋出现在联合国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仍旧没有意识到我们已取得的成绩。在90年代中期，已有两个女同志组织获得了ECOSOC资格，允许出席联合国的国际女性活动。但是，国际LGBT社区似乎直到最近才理解她们已获得的权利，许多组织也开始申请ECOSOC资格。这说明女同志们不了解她们自己的历史吗？或者说女同志们在女性议题上取得的成绩，LGBT社区的人并不怎么关心吗？这些问题没有清楚的答案，但是女同志们的确赢得了几场“可见度的战争”；这会使她们合理地向联合国申明她们的权利。

联合国：
我们曾经并且仍旧在那儿

女同性恋在联合国的简史

1980年，哥本哈根

世界女性十年会议的组织委员会通过了五项女同性恋议题工作坊的提议。全世界的女同性恋们投身这项工作，彼此联系，共同合作。

1985年，内罗比

国际女同性恋信息服务组织了七场工作坊，讨论教育、就业、健康、建立联系。女同志们在会上提出了详尽的需求。为了保护女同志们不受当地权威的干扰，会议领导撤销了女同志工作坊的场地，这个举动使女同志议题得到关注。在会议过程当中，来自荷兰的代表第一次公开谈论的同性恋议题。

1994年，开罗

在人口和发展会议上，“性的权利”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文件中。虽然这个词最终没有被收录，但是关于性的讨论非常热烈。

1995年，北京

一场国际宣传试图将女同志议题纳入官方会议议程，会议进程中设立专门的女同志“帐篷”。600多名女同志围绕着中国的国际新星进行游行。官方会议委员用了一个多星期会讨论了“性倾向”；这场讨论及其观点吸引了媒体的关注。一位来自南非的女同志在全体与会者面前以女同志代表的名义发言。

1998年，加拿大

维也纳五周年和人权宣言周年庆。150个NGO参与了国际人权论坛，产生了一份专门处理性取向的文件，包括最后LGBT组织给予的意见。

2000年，纽约——北京5周年

联合国大会继续了北京行动平台。在联合国千禧年峰会上，确立了八个千禧年发展目标，目的是为了与贫困、饥饿、疾病、文盲、环境破坏和歧视女性做斗争。

2005年，纽约——北京10周年

联合国女性地位委员会进行了对北京行动平台的十年回顾和评估。在政治风向上对性及生育权有敌意的美国右翼保守派对此进行了游说。尽管如此，北京行动平台的第96段话被重新确认了，保护了女性对于性的决策自主权。

从人权的角度看女同性恋运动

Gloria Careaga

2008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23届ILGA世界会议上，Gloria Careaga就女同志们参与联合国活动，无论是否通过ILGA，作了发言。

“联合国内从ILGA发展来的工作经历了很长的过程。

“我们参与国际会议很长时间了。1993年维也纳人权会议和艾滋病会议；1994年开罗人口和发展会议；1995年北京妇女世界大会，2001年德班反种族主义反歧视会议。男/女同志们都出席了这样的会议，ILGA也从中获取养料，形成自己的观点。从90年代起到现在，一直有人愿意以女同志身份展现自己，从维也纳艾滋病会议和世界妇女大会开始。她们非常坚定地展现自己，质疑政府强制减少她们的可见度。

Rebeca Sevilla，秘鲁人，ILGA秘书长，1993年作为一名女同志参与在维也纳的人权法庭。她和其他女同志们在法庭上的表现制造了关键的政治气氛，使得在维也纳会议上联合国承认了女性的权利。女同志们第一次开口谈论自己的经历，说出我们面对的主要困难，非常感人。

Patria Jimenez，墨西哥，在另一场重要的关于消除对女性歧视的会议上发言。有趣的是，与会的是两位拉丁美洲女同志，这打破了同性恋只与欧洲或是北美国家相关的想法。我认为她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刺激了有关男/女同志现状的新观点的产生，每次参与活动的人都越来越多。

另一件我想强调的事是在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上，我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有关性倾向的讨论。在1994年开罗的人口会议上已尝试将性倾向和性权利包括进官方文件，但是遭到强烈反对以至于没能取得进展。尽管有反对，年轻人的性——包括婚外性生活已得到承认，这在之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在国际政治中包含“性别”是非常重要的成就，尽管“性别”是“性倾向”和“性权利”的替代品，这些词汇为妇女大会打开了非常重要的讨论。

在妇女大会上，女同志、双性恋、异性恋的女性们联合成女权主义同盟推进性取向和性权利，这两个话题自1994年开罗会议遗留下，1995年被举为北京会议的主旗。我听到我自己国家墨西哥代表在1995年的会议上说他们从未像在此次妇女会议上一样地了解过性权利和性倾向，对此我印象深刻。我想强调会议上类似讨论的重要性和我们出现在这样的会议上的重要性。

北京：一场历史性演说

Palesa Beverley Ditsie

1995年9月13号北京，女同志团体代表，来自南非的Palesa Beverley Ditsie，向世界第四届妇女大会联合国小组发表意见。这是对女性恋关注度和女同性恋权利的重要活动。在北京之前，作为对世界各地NGO的回应，在纽约的会前准备委员会同意将女同性恋议题写入行动平台草稿。在北京的工作是保证女同志的人权会被清楚地写进最终的文件里，但是反对势力太强了。尽管对她们的保护没有被清楚地写进最后文件里，Ditisie的演说证明了女同志出现在了这样的会议，在世界级的论坛上的到了官方的承认。

“Madam 主席，

我非常荣幸作为国际同性恋人权委员会，国际女同性恋信息服务，国际同性恋联盟等50多个组织的代表，向各位出色的与会人员做报告。我是Palesa Beverley Ditsie，来自南非的Soweto，我在那儿生活了一辈子，体会到了我们团体的喜悦和痛苦。我来自的国家最近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去争取真正的民主，由公民来管理国家，所有的人权得到重视。南非的宪法禁止基于种族、性别，民族、社会地位、肤色、性取向、年龄、残疾、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歧视。在1994年4月9日开普敦的国会开幕演讲上，国家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宣布南非再也不会有基于性倾向的歧

Anna Leah Sarabia

我受ILGA邀请，加入了有大约二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团代，参加1995年北京NGO会议与纽约秘书处见面。秘书处是由一名菲律宾女性领头，在那之前的几个会议上我已见过她。在花了一个小时讨论北京会议组织者是如何歧视女同志之后，我们要求需要我们自己的空间来获得关注度。但是，秘书处说场地已经没有空余搭建我们自己的展台。因此，菲律宾组织Anjaree的Tang Suvarnananda向秘书处解释我们不需要奢侈的布置，只要有个帐篷就很满足，只要是为女同志搭建的帐篷即可。因为我们没提过分要求，他们就给了我们帐篷。至少，我们能从他们那儿拿到实际的东西。这给我就国际水平的协商上了很重要的一课。一年之后在北京再见面，那些在纽约会议上的人们，我们都不敢相信我们得到了我们要求的东西，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帐篷。也许我们应该重复一下：我们从全世界各地召集女同志们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秘书处见面，要求了一些他们都不好意思拒绝的东西。

视，他得到了热烈的掌声。

人权宣言承认了人“作为人类一员内在的尊严和…平等，不能剥夺的权利”，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无论种族、肤色、性、语言…或其他地位等的差别”。但是在世界各地，女同志们每天都在经受暴力、侵犯和歧视，就因为她们的性倾向。她们最基本的人权，比如说活着的权利，身体完整的权利，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都被违反了。女同志们被辞职，被强迫结婚，在家被打或谋杀，她们的孩子被怀有敌意的法庭夺走。一些女性因在家，宗教机构或是更广泛的团体中遭受排挤和偏见的困扰而自杀。这些凌辱记录于国际同性恋委员会性倾向和女性人权最近发布的报告中，以及大赦国际的报告中。但是，大部分的凌辱是非常难于记录的，因为尽管女同志遍布全球，我们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被边缘化和噤声。1994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宣布基于性倾向的歧视破坏了国际民事和政治权利规定的禁止歧视和隐私权。许多国家通过了禁止基于性倾向歧视的法律。如果世界妇女大会是处理女性的问题，那么它必须承认基于性倾向的歧视是对人权的破坏。行动平台文件的第48和226段承认女性由于多个因素在生活中面对特殊的困难，包括因为性倾向。但是，文件中的“性倾向”是加在括号里的。如果把这个词从相关段落里舍去，那么行动平台本身就成了女同志们所面对的歧视，以及对我们的存在认识不足。

现在女性能决定自己生活的方向了，却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性。性根植于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应受争议或胁迫。所有真心投入到女性人权问题上的人都必须承认，每位女性都有权利决定她自己的性，不受歧视不被压迫压迫。我希望这能成为一个为所有女性（不论性倾向）谋利的会议，我们也希望行动平台承认女同性恋的权利就是女性的权利，女性的权利是兼容并包的，不可剥夺的，不可分离的人权。我希望你去掉文中“性倾向”两边的括号。

谢谢。

Phumi Mtetwa

1999至2001任ILGA女联合秘书长，现任南非同性恋平等项目董事。

我一个印象深刻的经历是作为ILGA女联合秘书长参加了在纽约的北京五年回顾，3月的准备委员会决定回顾于2000年6月召开。我们和其他社会活动家一起把性取向写入联合国会议进程的重要议题里。那时美国试图阻止任何有关性与生育权的讨论。但当我自己作为它的代表，看到进步的女同志和女权主义者参与其中，并在群起支持ILGA的申明，觉得非常鼓舞人心。我记得和大赦国际的Cynthia Rothschild一起工作到深夜准备ILGA第二天的发言。我在ILGA期间深受Irene Leon的政治策略的影响，也获得她对我的个人支持，她对我的影响也体现在了我的发言中。

会议上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女权主义者和女同志们，在ILGA成员中我记得Irene Leon (FEDAEPS,厄瓜多尔); Gloria Careaga (El Closet de Sor

Juana,墨西哥); Dorothy Aken’ova (INCRESE，尼日利亚)。其他和我们共同工作的还有Susana Fried 和 Charlotte Bunch (国际女性领导力中心，US)和IGLHRC工作人员。其他工作伙伴有来自AWID的董事Lydia Alpiza Duran领导下的世界女性游行组织、自由选择天主教、拉丁美洲青年性权利联盟等组织。

我想要继续推进我们五年前在北京取得的成绩是很难的，特别是很多会议必须闭门展开——为了避免政治右翼的公民社会为了实施对于性和生育权的保守的对策而加压。对我们而言，我们努力获得承认并保护所有女性的权利。

自1994年起的女同性恋社会活动家联盟

Patricia Curzi 对 Jack Draper 的访问

为了消除对女同志的歧视，女同性恋社会活动家联盟于1994年在澳大利亚成立。它向澳大利亚政府游说消除对女同志的歧视。它还出版关于女同志健康，针对她们的暴力，恐女同症，家暴等的研究论文。它参与了国内外许多有关女性议题的会议。

你为什么在几年前决定申请联合国咨商的资格?

澳大利亚女同志社会活动家联盟在1994年获得了联合国CEDAW鉴定合格参加1995年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但是北京政府拒绝为女同志办签证。但是很多澳大利亚女性组织是由女同志领导的，她们带领团队为其他女性的人权工作，比如说，女性难民，因此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女同志声音。大多混合的LGBT组织都主要处理男性的问题，女同志的权利根本放不进会议议程。COAL接受多方咨询，得到政府资助，提供培训，在会议上发言比如在悉尼男同志比赛上、悉尼狂欢格拉萨上，还发表了几篇意见书。我们ECOSOC的资格是由北京的活动颁发的。

当你多年前得到联合国咨商资格时，是不是和 2006 年另外三个 LGBT 组织一样难?

我们的资格是之前获得的，但是COAL提供证据证明我们之中没有恋童癖并且我们代表澳大利亚女同志。过程并不是特别难。

为什么大部分LGBT组织是在2006年12月知道你们得到了ECOSOC资格?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即便在LGBT运动中，女同志议题也被搁置?

尽管COAL定期向CEDAW提供报告，包括在北京五年和十年回顾，我们也派代表出席那些会议，但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部分是因为我们是个女权主义大本营，我们负责和CEDAW会议和其他姐妹组织一起合作。这也体现了女权主义女同性恋在混合的LGBT组织中的微弱。我们

在1997年澳大利亚自由联盟政府上台后再也没有接受过资助，一直靠志愿者的力量支持着。

1998年之后
联合国的国际女同志工资

采访者：Patricia Curzi

国际女同性恋工资（IWDL），成立于1975年，致力于为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争取经济、法律权利和人权。她们是生活在城镇和村庄的女性，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年龄，有单身母亲、性工作者、务农者、移民、残疾者、家庭主妇、学生等。她们都是为女性争取应得的工资，以支持女性做出选择，包括对性的选择。

你为什么在几年前决定申请联合国咨商资格?

我们从联合国女性十年（1975-85）之始就参与了联合国工作，参与了家务工资的宣传活动。在1980年哥本哈根的十年过半的会议上，我们为没有薪水的工作游说，希望官方承认，在1985年，我们要求政府将未付薪水的工作算进国民生产总值。后面十年，IWDL是慢慢发展的国际女性社会关系网，游说政府要求他们遵循奈罗布的约定。最终，在1995年北京会议上，政府终于同意将未付薪水的工作加入到经济统计中，我们为此庆祝，但是我们为女性不因性取向而受歧视所做的游说却不是很成功。我们在做这些工作二十年后的1998年申请ECOSO资格。有些代表认为我们的申请会影响小孩变成同志，或是鼓励成年人与小孩发生性关系。我们问他们是否对现状感到满意：年轻的LGBT人群有很高的自杀率，因为谈论同性恋都几乎是禁止的。他们对恐同的反对渐渐消失了！

当年你们得到联合国咨商资格时，是不是和2006年另外三个LGBT组织一样难?

我们的申请比 ILGA 快很多；但是那些关于恋童癖的怀疑和我们是一样的。

为什么大部分LGBT组织是在2006年12月知道你们得到了ECOSOC资格？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便是在LGBT运动中，女同志议题被搁置?

是的。被忽视是女同志们面对的歧视的关键问题。尽管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家庭都是由女性主导—但没人知道其中有多少是女同志，或者有多少和男性成家的女性是

女同志。尽管全世界各地几乎都是女性生小孩和照顾他们，我们女同志却非得要遮掩这个事实。因此我们的贡献很容易就被否定或忽视了。世界上大多数女同志们无法公开身份；因此我们被迫过着双重生活，否则就面对着暴力、监禁、折磨和死亡。

没有孩子的女同志和双性恋女性经常帮助我们这样的家庭，组织和和社会运动，其他女性较少参加因为她们要照顾孩子和丈夫。但是草根的女性，不论是同志还是直人，都很卑微；我们都面对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其他占据社会有利地位人的监察。

当前 IWDL 的活动是些什么?

现在我们在英国为那些由于恐同性质的宣判和折磨而逃亡的人寻求庇护；我们也在喀麦隆、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动员女性发展社会关系网寻求支持。但是为她们找到同志名人和同志组织的支持非常困难。已在政府、商界、媒体上受到关注的同志似乎不记得他们是靠多年的草根LGBT的社会活动才有今天的成就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超越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为“人人平等”努力，无论别人是持什么护照、什么肤色、什么口音……我们也反对同志活动的去政治化和商业化，比如说骄傲节。

西班牙WDL为了照顾家人，包括照顾女同志的人争取社会福利。旧金山的WDL为因和警察冲突而成为受害者的女同志和双性恋女性争取正义，也为终结性工作这个罪名努力，性工作者中许多是女同志，她们通过性工作赚钱是为了自己的经济能够独立于男人。

2000年我参加纽约的北京+5会议时，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对联合国的影响非常明显，其表现在了联合国机构的公司化，后来联合国拒绝反对英美入侵伊拉克也是一项证明。还有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刚果强奸小孩换取食物，在海地进行屠杀以及没能够为巴勒斯坦因为国家不被承认而只能作为一个“非成员组织”存在做什么，因此我们减少了和联合国一起的工作。

ECOSOC资格使你们的工作更方便?

我们用ECOSOC资格来使草根女性的声音被权威听到，也有利我们在自己国家内带来改变，当然，我们和联合国机构保持独立，对草根LGBT人们负责，我们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做起。我们希望另一些有ECO-SOC资格的同志组织，包括ILGA能够和我们做一样的事情。

尽管对同志的压迫和歧视仍旧存在，我们很清楚地看到LGBT运动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社会运动所得到的关注度和权力使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拥有同性关系或是叫他们自己双性恋，或是拒绝任何标签。曾经试图否定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同志、性工作者或任何其他的名誉欠佳人群的社会组织和运动现在因为承认了他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强大。在变革中的委内瑞拉，查韦斯总理宣称“同性恋也有他们的权利！”；委内瑞拉同性恋革命运动正把此话变成现实，这鼓舞了我们。

获得在联合国发声的权利

Patricia Curzi 对 Maria Sjodin 的访问

2006年，瑞典同志、双性恋、跨性别者权利联盟 (RFSL)向联合国申请ECO-SOC资格，并于2007年7月获得。2007年1月和5月，执行董事Maria Sjodin和主席Soren Juvas去往纽约为RESL的申请辩解。RFSL在2006年3月的ILGA世界会议上被任命为女性秘书处，在2008年11月的世界会议上它们的授权被更新延长了两年。

RFSL 申请 ECOSOC 资格背后的战略是什么?

申请的决定在2002年ILGA德班种族主义和相关的排他会议上未被认证合格时就做了，但是，直到2005年我们才准备好所有申请所需的文书和翻译。对我们来说做这个决定，一方面是出于联合国拒绝ILGA为LGBT人们在联合国发声的失望，另一方面是因为RFSL近十年来对国际LGBT议题越来越多的兴趣。

你为什么觉得亲自出现在纽约为RFSL的申请辩解很重要? 为什么需要两个人?

一开始我们没打算要去；但是经过讨论和得到多方建议，特别是瑞典外交部，我们决定要躬行此事来增加成功的几率。我们之前已经收到几个问题并写了文章答复，很明显LGBT权利的反对者一定会让我们难堪。我们觉得团队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派了两人，并且选择不同性别的代表也很重要。

你面对有些敌意的听众的感觉是什么？你接到最令你惊讶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在NGO委员会里坐了一个礼拜，到后面我们才开始被提问，所以我们有机会在走上讲台回答问题之前进行观察并游说代表。我们想要展示出我们是非常严肃的组织，在委员会面前丝毫不受威胁。

他们问了我一些没有在瑞典国家报纸上公布的敏感的问题，更不要说那些在网上的问题了。很明显，我们在瑞典、埃及和其他地方的反对者有效地合作共享了信息。他们的问题是关于前些年我们的一个地方分支挪用公款的事。我们应对这个问题毫钱；但是要一个组织不可能完全不受其中个人行为的影响，除了一发现就向警方报告。我们也被问及对于联合国反腐败惯例的看法。我们还被问了有关学校的问题：埃及代表说，研究调查显示听说除了异性恋以外还有其他的性倾向后会影响男孩子的心理发展，我们如何在学校合法化我们的活动。他们也想确知我们未在同性恋非法的国家展开活动。他们的这些问题让我们觉得他们好像对我们的活动和对男孩子的影响更感兴趣，所以我们有两个人参加，其中一名为女士是一个优势。

ECOSOC 资格对 ILGA 女性秘书处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ECOSOC资格，RFSL能够给予

参与者认证参与到联合国最大的活动——女性地位大会(CSW)。2008年两个RFSL成员参与了这个活动；但是我们同时任命Gloria Careaga，现任ILGA联合秘书长，去建立社交关系，并增加女同性恋议题的关注度。2009年，我们组织和参与了唯一以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命名的周边活动——“看不见的女性的权利——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的人权”。活动目的是对在联合国和国际人权话语中提出女同志和双性恋女性议题的挑战和机会，进行建设性的讨论。

活动很成功：所以我们现在争取向瑞典政府寻求资助，希望他们支持2010年的周边活动，反对出于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觉察出的性取向、性别表达和性别身份产生的针对女性的暴力。尽管我们在快接近截止日期时才注册了活动，一开始我们没有被包括在内，也没有给活动举办的时间，和组织者联系之后我们才得到了参加资格，但是在联合国网站上的计划表里我们也还没出现。这有可能是个疏失，但也有可能人们觉得我们的题目有争议，但是看到这么多人出现在活动上，拿到了我们的宣传单，参加了我们白天的活动，那感觉真好，从此也看出存在以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议题命名活动的需求！

你从整个过程中学到了那些对其他LGBT组织也有用的经验？

我们学到了我们的对手很强，并且互相合作。他们具备详尽的知识，翻译过来的材料数量也多得惊人。从某方面说，这是给人力量的——知道反对LGBT人权的人是如此的害怕我们，让我们觉得当我们出现的时候（作为整个LGBT社会运动），我们能改变世界。

对我们而言，出席活动及和瑞典外交部合作非常重要，这样他们就能代表我们的主张了。整个ECOSOC过程以及我们出席和参与CSW都非常的正面——我们为自己发声，宣扬我们的存在。

结束语

新老朋友们

我们相信女同性恋团体能变得更强大，如果她们和老朋友合作，例如女权主义者和男同性恋团体，还有人权、民族和文化群体。对于这些团体来说，他们能从女同性恋团体对性别、社会强施的角色和将所有权利主流化的分析和反省中获益。

获得力量和提高意识

在“历史可被改变”这本刊物中有些正面的例子，女同志们成功地将她们的诉求主流化。共享经验和知识是发展技能和认识我们已取得的成绩和获得力量和骄傲的第一步。这份报告有着正面的色彩，我们强调女同性恋运动的未来，不在受害者的感觉上停留。

做自己历史的主人

我们希望给新一代的女同志一些新的角度，她们将是明日的女权主义者。有时即便是ILGA 里的年轻的女同性恋者根本不了解她们自己的历史。看起来老一辈不总能很好的向年轻人传授经验，为他们留下空间。知道自己的历史使人有力量，有些女同志没有意识到她们的前辈在艺术、政治和公民社会中有的影响。

这份报告能改变什么

我们希望改变对女同性恋的负面看法，认为她们只能和女同性恋自己合作，不愿意为其他事业工作。报告中的许多文书，故事和访问都说明事实与之相反，女同性恋团体比其他团体展现了更多的团结，这一点必须得到承认。女同志们有革命性的思考，这对所有争取社会平等权利和正义的人都会裨益良多。


STOP the war on women's bodies!
Sex Workers Demand: Action Against Abuse
KWETE! KWANELE! ENOUGH!
JUSTICE FOR KHWEZI
SOLIDARITY WITH



les+

联络与支持 les+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lesplus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123347/

网　　店：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网　　站：www.lesplus.org

邮　　箱：lesplus@yahoo.com.cn